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学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常本春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陈 思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4年 第1期 总第147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任编辑:蒋建忠 鲍跃华 王天海 宋 好

本期特稿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探颐与价值意蕴 / 洪向华 张光泽 4

政党制度

参政党开展专项民主监督难点问题与工作机制研究 / 刘超伟 11

多维叙事: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建构与传播力建设浅析 / 崔 珏 20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结构、过程与功能 / 张 霞 27

新的社会阶层

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典型范式、存在问题与提升路径——以江苏省为例 / 周 凯 曹济舟 36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 年 2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研究——基于江苏省 C 市的调查 / 郭晓东

44

民营经济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效能提升的路径研究——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 王 超 杜明润 陈芷怡

53

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逻辑理路与作用机制 / 陈 亮

60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浙江 11 个设区市的面板数据 / 余海凤

68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4 - 01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 理论探颐与价值意蕴

洪向华 张光泽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21 世纪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期文化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总结,是应对新时代新变局的有力武器。习近平文化思想论述新颖、内蕴深厚,致力于推进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始终贯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指出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第一要义,“两个结合”是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本部署,以人民为中心是工作导向,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战略布局。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作用,推动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力量。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建设;中华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发展上百舸争流,文化领域的国际竞争更是愈演愈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达到新高度,革命文化的继承弘扬开辟新局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呈现新境界。能够取得这些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保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对党的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梳理,也对未来文化建

设工作作出了规划指引。本文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探颐与价值意蕴三重维度着手分析,以求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理解。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有着严谨的发展脉络,在此从理论、历史、现实三重维度探析其生成逻辑,以准确回答习近平文化思想“何以由来”的时代命题。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底蕴渊博的思想体

收稿日期:2023-12-10

作者简介:洪向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党建、思想政治教育;张光泽,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提升机关党支部建设质量研究”(19@ZH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精神耦合生成的思想精粹，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 21 世纪发展的最新成就。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文化的相关表述。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多次提到“文”“化”。“黄裳元吉，文在中也。”（《坤卦·小象》）该句中的“文”本义是指“文饰”，但引申出的是大地所蕴含的温文深厚的品德。“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乾卦·文言》）该句中的“化”指的是德行中正之人能够感化天下，教化世人。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该句指出：人类的文饰上升到文明层面就是注重礼制的完备和道德的完美，（通过效仿观察天文）观察人文，进而推行教化促使天下昌明。在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作用就是依照当时统一的价值观念进行教化活动；进入新时代，日益重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当时欧洲物质文明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所以他们常将文化作为与物质产品相对的精神产品进行论述。他们都倾向于将文化打造为包含理论知识、意识形态、艺术生活的精神模式，并称文化是“时代精神”和“文明活的灵魂”。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1]由此，文化是对物质财富的填补，是与社会经济相对应的上层建筑。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更加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第三，党的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十月革命之后，国内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思想文化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内生动力。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始终坚持运用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来促进自身改造，带动

群众发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2]可见，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最初始便是人民，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期文化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总结，其产生过程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

第一，习近平七年知青时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萌芽期。1969年1月，不满16岁的习近平在延安梁家河村开始了七年的知青岁月。他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3]。彼时的习近平，既要抵住“文革”时期社会的压力，又要扛住梁家河恶劣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依然不忘坚持读书学习。读书成了他“最大的爱好”，无论古今中外的书籍，他都手不释卷，这就决定了他对文化积累的重视。在最基层的梁家河，习近平将文化理论知识应用于最基础的实践活动当中，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底蕴和实践基础。

第二，习近平主政地方时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期。习近平在正定担任县委书记时，明确提出了文化兴县的新思路，要求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把挖掘历史文化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措施，他对正定的历史、文物都十分上心，并组织编撰了《正定古今》^[4]。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对闽东的新闻事业发展非常重视，对新闻工作者也有很高的要求，他提出要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加大宣传当地的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5]。习近平在主政浙江期间，积极推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多次深入调查研究，提出“3+8+4”的整体框架，

这至今仍对浙江的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6]。这一时期,伴随职务的变迁,习近平的战略眼光也得到提升,关于文化思想的核心观点逐渐明晰,地方上的成功经验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确立埋下了伏笔。

第三,习近平中央工作时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成熟期。2007年11月至2012年12月,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他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始终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7]。自此,习近平关于文化方面的思想建设,实现了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巨大跨越,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形成。

(三) 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现实逻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正面响应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最新时代命题。

第一,国际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严峻。伴随着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我国全面高质量发展遭遇了来自西方的空前挑战,个别西方国家加快遏制我国发展的步伐,千方百计攻击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试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积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妥善处理前所未有的难题,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习近平文化思想回应了增强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能力、筑牢意识形态领域防线的现实需要。

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凭借独特的文化,一路披荆斩

棘,谱写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开创了全新的文化篇章。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重视文化建设,才能以更加开阔的思维和坚定的信仰,增强解决各种风险和挑战的骨气与底气。

第三,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社会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不平衡尤为明显。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现实需要包括对良好的道德风尚、积极的精神状态、深厚的文化底蕴、优秀的文艺作品的渴望,这些需要源于国民对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不懈追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激发群众的情感共鸣提供了精神指引。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探颐

习近平文化思想特点鲜明、内蕴深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从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核心内涵三方面对其进行理论探颐,以准确回答习近平文化思想“何以呈现”的时代命题。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总体目标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是对文化建设的强劲指引,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运文脉的高度重视和以文强国的时代追求。

第一,推动文化繁荣,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带动我国经济总量提升,与文化事业相互促进,对推动文化繁荣起着重要作用。推动文化繁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基础,进而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从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同时,要注重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促进文化产业与

文化事业协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建设文化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新时代文化繁荣的立足根本，实现文化繁荣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有力支持。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有着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底气，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长远繁荣和文化软实力的稳定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协同发展，坚持“七个着力”进行文化建设，实现文化进步，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第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积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尊重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响应人民文化吁求的必然选择，更是赓续传统文脉和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科学举措。”^[8] 需要我们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增强中华文化的渲染力与渗透力，构建独具中华魅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原则依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客观规律确立，是思想文化工作必须遵守的总的准则。

第一，坚定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集中展现，其基础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核心在于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我们要积极培育文化自信自强的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只有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明确自身的文化目的和立足点，才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确

保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不受制于人。

第二，秉持开放包容，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9] 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彰显着中华民族是开放的民族，中华文化是包容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10] 开放要积极有序，包容要理性客观，对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都不全盘接受或否定，对其进行改良改造以符合自身实际情况，才能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三，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守正就是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守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遵循，守住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这彰显了我们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传承定力和在发展进程中所体现的创新张力。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才能将这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文明持续传承下去。要继续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同时，还要积极促进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使其与本土文化更好地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华文化经久不衰，进而在新时代大放异彩。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系统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格局宏大，重点突出，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

第一，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第一要义。放眼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着眼国内，文化是多样的。在各式各样的文化当中，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科学先进的文化，其最本质表现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才能真正以科学态度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西方文化的有益养分，才能引领国内文化工作

向好向快向稳发展。新时代，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我们只有坚持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才能守好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阵地。

第二，“两个结合”是根本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精髓特质的系统性吸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与继承。

“两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生命体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骨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灵魂，是文化认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时代产物。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把思想文化从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中解救出来，才能真正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培养一批政治强、素质好、能力高的文化工作者，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工作建设稳步推进。

第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本部署。社会价值观念有很多，但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居于最中心地位。要注意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富强、民主不单是中国的追求，亦是西方的追求，但西方资本主义的富强是牺牲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富强，民主是精英阶层掌握的民主。只有培育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全体人民群众共同认可，才不会落入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

第四，以人民为中心是工作导向。重视民本、保障民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观念。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民本的观点，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关注人民需求，倾听人民声音，鼓励人民参与。新时代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活动的组织等，都以人民的需求为指引，同时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到文化建设的决策过程中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人民的需求和期望，才能制定出更加符合人民利益的文化政策。

第五，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战略布局。“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

命力。”^[11]古代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传入了西方世界，西方的音乐、绘画、科学等元素也融入了中国文化。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加大了中国与西方的交流，这不单是商品流通，更重要的是文化、思想的交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东西方文明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吸收，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日益减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意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继续推进思想文化建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深入剖析其当代价值，以准确回答习近平文化思想“何以阐扬”的时代命题。

（一）强调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

第一，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党性原则不仅要讲，而且要理直气壮讲，不能躲躲闪闪、扭扭捏捏。”^[12]主流媒体是党的思想理论的主要宣传阵地，承担着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丰富文化生活的重要作用。“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党的手里，从根本上避免发生颠覆性错误。”^[13]“体现党的意志就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就是宣传人民的主张”，各报刊、网络媒体切实增强看齐意识，做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践行者。

第二，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核心构成部分，其宣传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坚定不移地推进

爱国主义教育，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原则。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培养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国家安全观，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准确理解祖国的历史和现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各类宣传思想文化载体都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传播爱国主义文化，培育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把热烈的爱国情怀转化为实际行动，确保了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着力引导各族群众发扬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融互通互鉴互信得到了提升，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心理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得到了增强。

（二）推动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时代产物，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深知“结合”的现实必要，旨在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活力，进而推动新时代又一次思想解放。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百余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史证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不行，但是教条式地搬运马克思主义也不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华民族的实际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宝。新时代，结合中国文化发展需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应运而生，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工作的经验

总结。

第二，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进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是历经数千年创新改造后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我国有着先进的社会制度，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形态，就不能违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就要辩证地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元素。正如恩格斯当年说只有德国无产阶级才能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一样，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14]。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植根过去，反映现在，更会影响未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此进行文化再创造，使得中华文明继续发展、绵延向前。

第三，对党的思想文化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二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和文化底蕴。“根脉”与“魂脉”相耦合，成就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科学旗帜与行动标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特色之一，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底气与信心。作为“第二个结合”产物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三）提供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5]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实现文明高度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力量。

第一，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文化传承则是民族延续的血脉。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依托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华文化的兴盛需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进行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两个结合”造就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全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共同体。我

们没有因为文明古国的身份而沾沾自喜，也没有依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而停滞不前，而是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

第二，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古代德治、法治、民贵君轻、天下为公、礼法并重、知行合一、大公无私、选贤举能等思想精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融入了‘精神基因’。”^[16]这些“精神基因”就是全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时更重视其一元性的认同，如果不强调共同的思想文化土壤的话，各民族之间就会失去凝聚力，中国式现代化就更无处谈起。

第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17]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也得到了强化，中国在世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文化软实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范围。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西重东轻”的失衡格局逐渐改变，“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已经显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利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范围将得以继续扩大，国际文化强国形象也将日趋完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0.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4.

- [3] 梁家河编写组. 梁家河[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70.
[4]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正定[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246-252.
[5]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宁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270-274.
[6]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浙江[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341-344.
[7]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N]. 人民日报，2023-06-08(1).
[8] 付文军.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J]. 宁夏社会科学，2023(6)：1-7.
[9]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23-08-31).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8/31/c_1129834700.htm.
[10]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EB/OL]. (2022-07-15).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7/15/c_1128830256.htm.
[11] 习近平.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EB/OL]. (2019-05-01).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5/01/c_1124441540.htm.
[12][17]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81、97.
[13] 韩喜平，杨羽川.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指南——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J]. 思想理论教育，2023(11)：4-10.
[14] 陈先达. “两个结合”十二讲[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23：179-180.
[1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9.
[16] 洪向华，李梦珂.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鲜明特质与实践遵循[J]. 治理现代化研究，2023(1)：41-48.

责任编辑：宋好

参政党开展专项民主监督难点问题 与工作机制研究

刘超伟

摘要:专项民主监督是我国各民主党派就某一重大事项受中共党委委托而开展的民主监督活动,是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一种创新形式。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层面,均开展了专项民主监督活动。就目前实践情况来看,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在中共方面、民主党派方面以及双方联系配合方面均存在不少的难点问题。完善专项民主监督工作机制需要从程序性机制和保障性机制两大方面共同着力。程序性机制包括委托机制、知情机制、沟通机制、反馈机制、落实机制,保障性机制包括考评奖惩机制、监督机构建设、能力提升机制、监督联动机制以及其他保障机制。

关键词: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机制

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是指我国八个民主党派受中共党委委托,就有关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决策的实施或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的专项监督活动,是我国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的一种创新形式,旨在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职能和其组织独立、性质超脱、人才聚集、使命高尚等优势,从异体监督的角度帮助中共党委和政府发现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问题,提出善意的批评或诚恳的意见、建议,从而帮助中共更好地解决问题并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

一、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的提出与实践

(一)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的提出过程

1989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作了具体阐述。2005年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单列成一节,对其性质、内容和形式进行明确说明。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

收稿日期:2023-12-11

作者简介:刘超伟,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多党合作教研部副教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广西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现代化与多党合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2022年度招标课题“参政党开展专项民主监督难点问题与工作机制研究”(KT202206)的研究成果。

出：“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制度上保障和完善民主监督，探索开展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2015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十四条提出，“受党委委托就有关重大问题专项监督”^[2]。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完善知情、沟通、反馈、落实等机制”^[3]，明确要求中共各级组织和干部要从态度上尊重、从机制上保障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权利。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4]，将专项民主监督写进党的重大决定之中。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十五条完整保留了“受党委委托就有关重大问题专项监督”这一提法。

（二）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的实践活动

自2015年中共中央提出专项民主监督这一概念后，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党委层面均开展了委托民主党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实践活动，并取得了突出成效，不仅有效提升了民主监督的效能，还在监督实践中促进了党派组织的发展，更是帮助中共有效推进和完善了相关重点工作。

1. 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的专项民主监督活动

从2016年开始，中共中央已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两次专项民主监督活动。第一次是从

2016年6月到2021年3月的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第二次是从2021年6月到2026年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以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为例，在具体实践上大致包括六项流程：一是中共中央委托和动员，二是各民主党派中央做好准备工作，三是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实地调研活动，四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撰写并提交民主监督工作报告，五是各民主党派中央借助民主监督活动开展扶贫帮扶活动，六是中共中央组织召开总结大会。每个流程都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流程与此类似，目前仍在具体实施阶段。

2. 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开展的专项民主监督活动

据各类媒体报道，近年来各地方民主党派开展了系列专项民主监督。例如，2016年，中共上海市委就“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委托各民主党派市委开展专项民主监督，随后每年上海市委便确定一项监督主题委托民主党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2017年，河南省政协围绕“水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南京市政协围绕“千名委员百日推进河道整治”开展专项民主监督。2018年，湖北省政协围绕“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随后每年围绕不同监督主题开展专项监督活动。2020年，河北省政协围绕“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落实”以及“促进县域科技创新跃升”，楚雄州政协围绕“营商环境提升”，南京市政协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共天津市委委托各民主党派围绕“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分别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上述地方具体的监督实践通常包括党委（政协）委托、制定方案、业务培训、对接启动、实地调研、撰写报告、提交报告、召开座谈会等环节。

二、参政党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难点问题

（一）中共方面

中共是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的委托方和发起

者，也是整个活动的领导者，同时还是被监督的对象，这决定了中共各级党委在整个专项民主监督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共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力度直接决定了专项民主监督的成效。现实中，中共党委和政府方面常见的难点问题包括以下四点。

1. 党政部门对专项民主监督认识不足

部分党政部门特别是其领导干部对专项民主监督还存在认识不足和心理抵触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党政部门领导干部认为我国的监督体系已经很完善，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等权力性监督约束力强，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为权利性监督影响力大，因此不再需要约束力和影响力都较弱的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认为参政党与其把精力放在没有强制力的民主监督上，还不如把精力放在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上，在中共的领导下少挑毛病，多出好主意，当好中共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认为专项民主监督就是在给党委政府找茬，就是在质疑中共的执政和领导能力，就是在破坏和谐的多党合作关系；认为专项民主监督多了，只能给党政部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让党委政府疲于应付，会降低党政部门的工作效率。这些认识偏差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人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对被监督缺乏正确认识，甚至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2. 尚缺乏一套常态化的监督委托机制

专项民主监督是一个新事物，仍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阶段。从实践来看，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还缺乏常态化的委托机制，今后能否持续推进并没有机制的保障。在中共中央层面，已经充分认识到专项民主监督的价值和意义，自各民主党派中央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结束后，紧接着启动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实现了专项民主监督的持续化。在中共地方党委层面，现实中真正发起专项民主监督委托并组织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活动的，还仅限于少部分省份或城市，而能够将专项民主监督一年一年持续坚持下来的更是屈指可数。究其原因，在于全国缺乏一套完

整的专项民主监督委托机制，不能将专项民主监督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固定下来。

3. 存在不关注和被动应付监督的现象

专项民主监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专项”两字，具体表现为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委只委托一项重大事项或重大问题开展专门监督活动。实践中经常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非专项民主监督所监督事项主管单位的党政部门不关注该项活动，认为没必要花时间去了解该工作，不能积极营造一种支持专项民主监督的良好氛围。而那些还没有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地区，当地党政部门对专项民主监督的关注度更低。二是作为专项民主监督所监督事项主管单位的党政部门有时会淡化这项工作，往往出于上级党委亲自委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压力，对参政党查阅相关资料等监督行为被动配合，有选择性地提供相关数据和信息，对参政党在专项民主监督汇报材料中提出的相关问题采取被动应付态度。

4. 尚未建立民主监督的考核奖惩机制

对党政部门和各民主党派就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业化考核存在理论和事实上的可行性。由于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其机制体系还没有搭建完成，至今仍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不能在被监督的党政部门之间以及开展监督的各民主党派之间形成横向的比较。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往往要同时搭建、一体推进，才能更好地发挥机制的引导作用。考核能够发现彼此的差距，奖惩则能够激发互相赶超的动力。目前，关于专项民主监督奖惩机制也没有搭建完成，在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中业绩突出的党政部门和参政党没有得到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工作表现较差的党政部门和参政党也没有被约谈或惩处。

（二）民主党派方面

1. 对专项民主监督存在认识偏差

长期以来，民主监督成为各民主党派三项基本职能中的短板和弱项，这和各民主党派对民主监督的认识存在偏差有直接关系。一是认为专项

民主监督作用不大。错误地认为专项民主监督很难改变民主监督职能发挥的现状。二是认为专项民主监督与自己无关。部分民主党派成员错误地认为专项民主监督只是党派专门部门和专业人士的事情，自己只是兼职参与党派工作，也没有被选为专项民主监督小组成员，没必要关注和参与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三是认为参与专项民主监督对自己没有好处。部分民主党派成员从功利性的角度来衡量参与专项民主监督的得与失，片面认为参与监督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和好处，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还可能因为监督不当而得罪人，因而对专项民主监督采取漠不关心、刻意回避的态度。

2. 党派缺乏民主监督的专门机构

根据各民主党派中央的网站显示，大部分民主党派中央还没有建立专门的民主监督机构，各民主党派省级机构均效仿其中央机构来设置工作部门和各类专门委员会，也没有建立专门的民主监督机构，各民主党派市级及以下组织受制于人员和组织规模限制，更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监督机构。在已经开展的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中，部分民主党派依靠其社会服务部作为该专项民主监督的主责部门，落实专项民主监督责任，如民建中央、九三学社中央等；有些则是成立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临时监督小组，如民进在其中央机关专门增设了专项监督工作处，农工党中央成立了专门办公室。民主党派缺乏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职人员来负责民主监督工作，虽然设立的临时性监督组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乏机构的不足，但从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的常态化发展来看，仍需要民主党派建立一个专门负责民主监督工作的执行机构。

3. 专项民主监督的动力相对不足

一是不想监督。相对于民主监督，参与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工作风险小、收获多，这导致不想监督的心理出现。二是不愿监督。现实工作中，因担心深入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提出批评会给党派自身发展带来麻烦，对民主监督存在有意回避

的态度，不愿主动开展监督活动。三是不敢监督。不敢迈出步子深入监督，多提建议少作批评，尽力在完成中共委托的任务和不得罪人之间寻找平衡。

4. 专项民主监督的能力有待加强

一方面，党派成员多为高学历、高职称、高知名度的专家或代表性人士，本职业务出色；另一方面，他们大多以兼职为主，对民主监督关注少、参与少、经验不足，导致专项民主监督能力欠缺。专项民主监督作为一个新事物，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更多的实践积累来进一步提升工作能力。同时，无论民主党派内部，还是各党派之间，关于专项民主监督经验分享和交流的活动还比较欠缺，好的经验和技能没能得到广泛传播，大部分党派成员对专项民主监督还缺乏必要的履职能力。此外，党派成员得到的关于专项民主监督的技能培训机会较少，现实中仅有个别党派在接到专项民主监督委托后，临时举办短期业务培训班，但没有开展常态化的培训活动，也缺乏专项民主监督技能方面的培训人才和课程。这些原因都导致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能力相对不足，不能满足新时代多党合作对民主党派监督能力的需要。

（三）双方联系配合方面

1. 信息分享不充分

获取全面、真实、足够的信息是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基础，但目前还缺乏健全的知情机制。一是不配合分享信息。个别被监督的党政部门分享的信息仅限于公开发布的文件，对民主党派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的申请置之不理或找各种借口不提供有价值信息，致使民主党派难以获得有效信息而无法正常开展监督工作。二是不主动分享信息。一些被监督的党政部门不愿意主动对接民主党派并提供相关信息，只是在民主党派提出申请时才会提供相应的信息。三是不全面分享信息。个别党政部门秉着对方要求提供哪些就分享哪些的原则，对民主党派没有提到但又与监督工作相关的信息则闭口不谈、不予提供，并对分享的信

息做事前筛选，以涉密或涉及当事人隐私等借口刻意回避某些信息，这使民主党派仅从可获取的信息中很难发现深层次问题或仅能发现表面的小问题。党政部门不能充分提供专项民主监督工作所需要的信息，会因“信息困境”造成最终监督效果打折扣。

2. 沟通联络不健全

专项民主监督工作需要党委政府和各民主党派之间保持经常性沟通联络，以便双方互相交流、互通有无、密切合作。现实中，双方沟通联络仍不健全，没有形成专业化、经常性的沟通机制。一是双方均没有落实沟通部门和责任人。部分党政部门没能根据民主监督工作的需要在内部设立专门处理专项民主监督的责任机构，也没有落实负责处理该项工作的工作人员；各民主党派没有设立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专职部门。二是沟通渠道较少。目前的沟通多为双方共同参加的情况通报会、协商座谈会等，这类沟通方式有一定的周期性，不便于双方及时沟通。在中央层面已经健全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反映问题的渠道，但在省、市层面还缺乏这类专门沟通渠道。三是双方沟通互动不多。部分党政部门不注重与民主党派的沟通交流，涉及重大决策的重要会议、重大调研不能主动邀请民主党派列席或参与，较少主动组织由民主党派和群众代表参加的交流活动，不能在日常工作中做到广泛向民主党派收集意见建议等。

3. 反馈工作不到位

只有监督，没有反馈，或没有充分到位的反馈，都会使民主监督缺乏活力和动力，从而影响民主监督的有效性^[5]。现实中，党政部门反馈方面常见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反馈。鉴于民主监督机制的不完善，除政协提案要求党政部门必须反馈外，其他民主监督形式还缺乏相关制度约束，有些被监督的党政部门在接到民主党派提出的监督报告后采取不反馈的冷处理方式，造成专项民主监督无法发挥真正作用。二是

反馈不及时。有些党政部门对民主党派提出的问题没有高度重视，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致使民主党派迟迟得不到问题整改的反馈信息。三是反馈不全面。有些党政部门仅将本部门提出的整改计划或采纳建议的情况反馈给相关民主党派，对具体如何落实、不采纳理由、整改落实效果等信息没能做到全面反馈，造成民主党派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成效缺乏了解。

4. 合作整改不规范

目前，我国关于专项民主监督的规定多以文件为主，内容相对简单，多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条文。以《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为例，仅在第五项“工作保障”中作出规定：“建立成果会商机制，各有关方面就调研成果和工作进行沟通交流、共同研究。”^[6]目前来看，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整改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合作整改的相关制度规定。如缺乏对被监督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参与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中的责任规定，没有赋予民主党派在专项民主监督中对党政部门整改工作的质询督办权利，没有建立起由党政部门和提出问题的民主党派合作参与整改活动的机制等。二是现实中合作整改的实践较少。针对专项民主监督发现的问题的整改，多为被监督的党政部门开展调研、查证、整改，忽视了提出问题的民主党派中可能就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很少主动邀请民主党派派出专家参与整改活动，也很少邀请民主党派专家担任整改工作的顾问，致使整个整改活动缺乏民主党派的有效参与。

三、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的工作机制建设路径

所谓机制，原本是一个自然科学概念，指一个系统内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后被引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可以理解为机构和制度的合体，是制度化的做事方式和方法^[7]。在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中，建立健全完善的工作机制体系，确保监督工作有规范的程序性机制和保

障性机制，是发挥专项民主监督效能的必要条件。

（一）程序性机制建设

专项民主监督的程序性机制涵盖了整个监督的委托、知情、沟通、反馈、落实五个环节的内容，包括了发起委托、开展监督、问题整改的整个监督过程。

1. 建立常态化专项民主监督委托机制

专项民主监督始于中共各级党委的委托，只有中共党委不断健全和完善委托机制，才能使该监督活动转变成参政党履职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持续发挥其在多党合作中的作用。一是中共中央层面：一方面，要及时总结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两大实践活动的经验，分析不足，在此基础上制定有关支持各民主党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文件，为专项民主监督活动的持续开展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专项民主监督的宣传报道力度，为常态化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积极营造良好的民主监督氛围。二是中共地方党委层面：一方面，要切实转变观念，摒弃在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专项民主监督“无用论”“麻烦论”“无关论”以及轻视、忽视、抵触专项民主监督的认识，培养主动接受监督、积极配合监督的正确意识；另一方面，要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借鉴中央和先进地区成功经验，积极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委托活动，围绕本地区党委政府重视和人民群众关注度高的重大问题开展委托，做好本地区专项民主监督的活动规划和制度设计，确保专项民主监督在地方层面能够顺利开展。

2. 完善民主党派获取信息的知情机制

知情环节畅通是保障专项民主监督能够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这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党政部门方面：用好现有的信息共享渠道，如利用定期举办的专项民主监督座谈会、通报会及时分享与监督专题有关的信息，利用党政部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渠道及时发布非涉密信息；探索新的信息共享渠道，如建立党

政部门向民主党派分享信息的通报机制，定期向民主党派发送涉及专项民主监督的资料信息，探索建立党政部门相关重大会议邀请党派负责人列席机制，允许民主党派到党政部门查阅有关资料信息等。二是各民主党派方面：通过党政部门渠道获取充足的信息，如高度重视对党政部门主动分享信息的收集分析工作，主动从其官方网站等权威渠道检索自身所需要的信息，主动向党政部门申请提供或到对方单位查阅相关信息等；通过党派自身渠道获取信息，如组织本党派成员深入一线开展实地调研，特别是对基层党政部门和人民群众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到专项民主监督涉及问题的项目现场查看收集线索，通过本党派官方网站开展相关问题的在线调研和信息收集活动，对接本党派的基层组织或社会团体了解相关情况，通过本党派的特约监督员收集相关信息等。

3. 畅通专项民主监督的沟通机制

监督主体与客体的沟通与互动伴随着专项民主监督的整个过程，是发挥好专项民主监督作用的必要条件。这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主客体双方定期会议交流机制。在专项民主监督的整个工作过程中要组织召开启动部署会、中期交流推进会、总结表彰会等重要会议。如果专项民主监督的周期是一年，最好每半年或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推进会。在召开的推进会中，作为委托方的中共党委主要负责人应出席会议，本地区涉及监督事项的党政部门以及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共同出席会议，双方就前一阶段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开展情况、取得的成效、遇到的问题、需要中共党委解决的事项、下一步工作打算等内容开展深入有效沟通。二是探索建立新的沟通渠道。例如，建立各民主党派与被监督党政部门的对口联系机制，在双方分别设立或指定负责沟通交流的责任部门和具体业务负责人，专门负责专项民主监督中的沟通联系工作，妥善处理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再如，探索建立由各民主党派向同级

中共党委政府和被监督职能部门直接报送专项民主监督汇报材料的“专报”制度，“专报”类似党派的内参，由民主党派定期将专项民主监督汇报编入“专报”并以本党派的名义直接提交到党政部门。

4. 设立专业化专项民主监督反馈机制

没有良好的反馈机制，就可能导致专项民主监督工作“有来无回”，直接影响民主党派开展监督工作的积极性。建立专项民主监督反馈机制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明确被监督党政部门的反馈责任，要求凡是被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批评建议的党政部门均应作出正式反馈，不能忽视、回避专项民主监督。二是建立分层反馈机制。问题较小且可以立行立改的只需反馈一次。问题复杂需要一段时间的反馈两次：第一次是在收到民主党派提交的监督报告的两周内作出正式反馈，反馈内容主要是对民主党派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的情况，对批评意见的研判分析情况，对提出意见建议的采纳落实情况以及不采纳理由说明等；第二次是等到民主党派反映问题彻底整改或解决后，将整改过程和结果向民主党派进行反馈。如果民主党派对党政部门的反馈不满意或还有疑问，可以针对这一问题继续要求被监督党政部门作出进一步反馈，直到提出的所有问题均得到答复为止，这是对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反馈机制的必要补充。

5. 建立专项民主监督事项的落实机制

整改落实环节是整个专项民主监督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要建立党政部门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整改落实机制。一是被监督党政部门负责落实机制。当被监督的党政部门收到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的监督报告后，要及时组织召开由本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分析研判会议，逐项逐条分析党派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批评、意见、建议，需要开展整改工作的要及时成立整改工作组，落实整改工作的具体责任人，制定整改落实工作计划，有序推进整改落实工作。二是建立中共党委

督办机制。对于被监督党政部门没有及时开展整改落实的，发起委托的中共党委可进行督办，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并提交整改落实情况汇报。三是建立民主党派质询机制。赋予民主党派在相关会议发言或者以书面形式向被监督党政部门就专项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质询的权利，要求被监督党政部门进行解释说明并提供切实开展问题研究和整改落实的佐证材料。四是民主监督双方的联合整改落实机制。被监督党政部门在整改落实工作中可积极邀请提出监督问题的党派成员参加相关会议和整改落实活动，也可以邀请他们担任整改落实活动的专家顾问。

（二）保障性机制建设

保障性机制的建立能为推进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工作提供外在保障和行为引导，能够促进上述各监督环节得到有效实施，是推进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不可或缺的内容。

1. 建立专项民主监督的考评奖惩机制

通过考核评价分出优秀和后进，进行奖惩，是在日常工作中被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行为引导办法。考评机制与奖惩机制要同时建立、配套使用，方能发挥作用。一是建立专项民主监督考评机制。建议成立由中共党委统战部牵头，涵盖中共党员、党派成员、相关问题专家学者的考评小组。针对党政部门，可重点考评其是否成立负责对接参政党民主监督的部门并落实具体责任人，是否及时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整改落实活动，是否制作保留专门的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台账，是否充分采纳参政党提出的意见建议等。针对各民主党派，可重点考评其是否成立专门的监督部门或明确负责人员，是否制定专项民主监督方案，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会议和调研的次数，提出监督报告以及被党政部门采纳意见建议的数量，监督事项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大小等。二是建立专项民主监督奖惩机制。充分依据考评结果，对在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党政部门和民主

党派给予绩效加分、颁发荣誉证书等奖励，对表现突出的党政部门负责人、党派负责人及具体参与的工作人员进行通报表扬，颁发荣誉证书，将其突出表现作为晋升或职称评定的重要参考因素；对考评中表现较差或在监督过程中没有履职的党政部门和民主党派给予绩效扣分、通报批评，对其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谈提醒等。

2. 加强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机构建设

关于在民主党派内部建立一个怎样的民主监督机构，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建议，有的建议设立民主监督工作委员会，有的建议单独设立监督部，有的建议设立监督监察委员会。本文建议在设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机构时，充分考虑本党派自身情况，本着充分发挥党派人才优势和更好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原则进行设立，不必强调各党派“一刀切”。要配强民主监督机构的负责人，挑选监督责任心强、监督能力突出的党派干部担任民主监督机构负责人，负责领导和谋划本党派包括专项民主监督在内的民主监督工作。同时，也要配足民主监督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挑选有民主监督实践经验及强烈监督意愿的成员充实机构，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履职能力强的民主监督人才队伍。要制定和明确民主监督机构的工作职责和权利，负责领导和执行党派组织包括专项民主监督在内的各种民主监督工作，收集、整理、审核党派成员报送的有关民主监督的信息和材料，组织党派成员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调查、研究、访谈、交流活动，以党派名义与党政部门就民主监督工作进行沟通协调，开展党派民主监督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研究工作，制定和完善党派民主监督方面的制度，负责各民主党派之间民主监督履职方面的联系交流等。

3. 强化专项民主监督的能力提升机制

进一步提升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能力，是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改变民主监督职能发挥不充分现象的必要条件。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开展专项教育培训活动。

培训内容应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多党合作和党派履职的大政方针，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相关制度、基本要求、注意事项，专项民主监督涉及工作和领域的知识等。培训形式应包括常态化培训和临时性培训，在党派成员日常履职能力培训中要设置关于专项民主监督方面的课程，在接到中共党委专项民主监督委托时，要专门组织一次党派内部的培训活动。要充分发挥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的“联合党校”作用，开设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提升培训班。二是开展党派间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交流活动。例如，由中共统战部举办各民主党派参加的专项民主监督经验交流会，组织召开专项民主监督履职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党派地方组织到本党派中央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学习考察活动，各党派之间就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开展实地考察交流活动。三是加大民主监督实践锻炼力度。在党派内部鼓励尽量多的成员参加专项民主监督活动，建立由民主监督履职能力强的成员结对带领新成员的机制，党派中央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时适当选派本党派地方组织成员参与监督活动。

4. 建设与其他监督相结合的联动机制

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属于权利性监督，是一种只求“说得对”不求“说的算”的监督，如果能将专项民主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充分结合，将有利于发挥各自监督的优势，形成监督合力。具体可探索四种监督联动形式。一是与中共党内监督的结合。例如，中共可将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转发给涉及的党政部门，要求其进行查摆整改，并将整改落实情况作为中共党内巡视和督查的内容之一。再如，民主党派在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活动时可寻求与中共党组织或党员干部的合作，共同开展调研活动，撰写监督报告或决策咨询类信息。二是与人大监督的结合。利用一些党派成员的人大代表身份，参与人大有关专项民主监督涉及事项的监督活动，以人大监督的权力性为专项民主监督提供服务并增强其约束力。三是与舆论监督的结合。

在报刊、电视、主流媒体网站开设专项民主监督类专栏，报道专项民主监督工作，设立与群众互动渠道，发挥媒体平台的宣传和信息线索收集优势，借助社会舆论扩大专项民主监督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四是与群众监督的结合。利用党派基层组织 and 成员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优势，加强一线调研，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等民意信息，通过专项民主监督的渠道将群众监督建议进行收集和提交。

5. 完善专项民主监督的其他保障机制

除了上述保障性机制外，还应从三个方面继续完善参政党专项民主监督的保障性机制。一是权利保护机制。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民主党派依法享有充足的专项民主监督权利，如独立开展调查研究、客观提出批评建议、争取党政部门配合、要求党政部门反馈等权利。二是批评免责机制。在坚持中共政治领导和多党合作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鼓励民主党派在专项民主监督中敢于提出深层次的问题，尊重民主党派在某些具体事项上提出并保留不同的意见，不能因民主党派的批评和意见与事实存在一定偏差而追究党派或党派相关成员的责任。三是经费保障机制。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的地区应设立专项经费，确保专项民主监督工作有充足的经费用于考察调研、学习培训、

信息收集等活动。各民主党派在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时要做好充足的经费预算并做到专款专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N]. 光明日报, 2013-02-08(1).
- [2]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5: 12.
- [3]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N]. 光明日报, 2016-11-02(6).
- [4]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19-11-06(1).
- [5] 张惠康. 参政党民主监督功能研究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 230.
- [6] 关于印发《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EB/OL]. (2017-10-11). https://www.mj.org.cn/mjzt/content/2017-10/11/content_269898.htm.
- [7] 刘超伟. 进一步完善我国参政党民主监督机制体系研究 [J].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1): 31.

责任编辑: 王天海

多维叙事：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建构与传播力建设浅析

崔 珏

摘要：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伟大政治创造，蕴含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讲好政党制度的中国故事，增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阐释能力，其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坚定制度自信、推动制度发展、实现有效传播，增强软实力和话语权。对此而言，目前的短板可能不在“故事”而在“叙事”。本文拟从历史叙事、现实叙事、理论叙事、交流叙事等多维叙事视角，探讨推动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建构与传播力建设的方法和路径。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叙事；话语建构；传播力

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推进。这一复杂的过程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推动，叙事是其中的一种语言手段。叙事理论是用来研究和分析故事结构、叙事方式和叙述效果的一种理论。它关注故事如何被构建、传达和接受并产生影响。政治叙事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叙事，政治叙事通过讲故事，描述、解释或证明某种事实，以塑造认同、赋予价值。增强对我国政治制度、政治发展道路的阐释能力，对中国民主实践作出系统思考和表述，不仅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意识形态博弈的需要，也是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伟大政

治创造，蕴含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讲好政党制度的中国故事，其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坚定制度自信、推动制度发展、实现有效传播，增强软实力和话语权。对此而言，目前的短板，可能不在“故事”而在“叙事”。讲好故事的要素既包括历史传统、现实绩效、核心概念，也包括交流话语、传播途径等。本文拟从历史叙事、现实叙事、理论叙事、交流叙事等多维叙事视角，探讨推动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建构与传播力建设的方法和路径。

一、历史叙事：以大历史观塑造政治认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它孕育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程，形成于协商创建新

收稿日期：2023-12-16

作者简介：崔珏，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背景下参政党建设的新态势和新问题研究”（ZK202002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的伟大实践，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成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政党政治百年演进的制度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成果。运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重要史迹在重要时间节点展开对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历程的叙述，以增进政治共识，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和较好的成效。

历史传统教育是坚定道路自信的重要途径，其中包含丰富的个体情感叙事和集体叙事。目前开展的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的活动，以历史叙事为主要形式。“讲故事是组织逻辑传达的一种有效方式，组织中的个人往往根据其所听到的故事来引导自己的行为。”^[1]为了让社会各界充分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道路和制度特色，人民政协网组织各重点新闻网站开展“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网络主题采访活动，人民政协报开设“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专栏展示采访成果。从哈尔滨马迭尔宾馆和政协文史馆到沈阳、西柏坡、北京等场景，回溯一个个重要的历史瞬间，凝望护送在港民主人士成功“北上”解放区的足迹，展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风雨同舟、合作前行，筹备新政协的过程，让人感受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光荣使命和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如在马叙伦孙女的讲述中，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马叙伦先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政治嘱托的深刻内涵。这种叙事仿佛推开历史之门，与先贤对话，从先辈故事中汲取智慧力量。

历史叙事中，“叙述是再现甚至是解释历史事件的有效模式”^[2]，当读者认识到历史叙事中的故事是特殊的故事，就已经理解了话语所产生的意义。例如，对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五一口号”发布的回顾和纪念，其叙事本身就带有意义，或者是建构意义。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

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在“五一口号”的目标下，迅速汇聚起各方面民主力量，积极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口号”，是在两种命运的大决战面前，作出了支持中共政治纲领和路线的重大政治抉择。这一过程中的新政协筹备进一步推动各民主党派在领导权和革命道路方面形成了共识，从而为多党合作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70多年来，“五一口号”开启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对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意义非凡。新政协的召开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协商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获得了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是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缔造政治合法性。协商建国的过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初步形成。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商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民主相互补充，构成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民主形式和中国政治发展模式。每逢历史节点，重温“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作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历史叙事要有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强调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观照现实，“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阐释清楚“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后找到的正确道路”^[3]。阐明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同样要把握历史方位，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各民主党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的历程，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贯通起来。要把握重要历史节点阐释问题，把握好历史、现实、未来的内在联系以及制度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讲清楚中国政党政治实践和新型政党制度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新型政党制度对政党政治普遍规律的暗合、发展与贡献。

一直以来，新型政党制度历史叙事十分丰富，并开始采用新媒体形式，多样化呈现多党合作故事，初步形成包括内容、形式、目标等在内的叙事体系，是坚定制度自信、加强各民主党派政治思想建设的必要环节。存在的不足是叙事对象范围较窄，主要限于统一战线成员，而社会领域广大民众对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了解和关注不足。

二、现实叙事：以实践成果诠释制度优势

马克思指出：“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4]如果说历史叙事重在塑造认同、观照现实，那么立足实践前沿的现实叙事，以实践成果诠释制度优势，则能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注入生命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的前言部分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5]新型政党制度的“新”之所在及其独特优势，只有从多党合作的新气象、参政党的新作为中体现出来，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彰显出来，才能为人们所感知和认同，进而让人自觉增强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的目标任务有着团结、民主、治理三大指向：通过统一战线实现各政党组织和政治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为实现共同目标凝心聚力；通过协商民主方式，引导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着眼治理现代化要求，形成各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政治领域，政治协商已实现制度化程序化。每逢重大决策出台前，中共都会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协商座谈，交换意见。中共在人民政协中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也在有效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政党协商会议 185 次，其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

开 42 次，就重大问题同党外人士真诚协商、听取意见。全国政协围绕国之大事、民之关切，召开 18 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20 次专题协商会、140 次双周协商座谈会、16 次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51 次专家协商会，协商方式和平台载体不断创新完善^[6]。这些高层次的协商活动通过全媒体广泛报道，产生了积极社会影响。关于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成果也比较丰硕。各民主党派中央长期以来持续开展“大调研”，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政策制定和重大战略实施提出意见建议千余件，一批重要建议已转化为党和国家的决策。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中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八个民主党派中央 2016 年首次对国家重大战略进行专项监督，即对口 8 个脱贫任务较重的中西部省份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自 2021 年起，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继续开展为期 5 年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通过组织实地监督调研，已向中共中央报送专报、向对口省份党委政府反馈意见和建议数百份。各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地方的履职活动，是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重要体现，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现实叙事不仅要呈现多党合作要闻、人物风采、相关数据，还需要以具体、生动的形式，对协商内容和程序、监督方式和效果、参政议政的声音和影响进行多层面反映，着力书写多党合作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积极作用。要看到“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不仅是政策制定科学性的需要，而且是整合消解派别政治、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7]。人民政协网开展的“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网络主题采访活动，报道了贵州大方县一所小学和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培养、教育质量方面的改善，生动呈现农工党中央在当地

30年教育帮扶的显著成效，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新型政党制度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显然超越了传统政党制度功能范畴。这样的现实叙事有助于人们认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性，理解“衡量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能否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8]。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只有对其运行情况、制度效能进行多重书写，才能充分彰显其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独特优势。

现实叙事基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逻辑，事实胜于雄辩，成就赢得尊重。社会发展与制度运行都是动态的过程，现实叙事既要彰显制度运行中的创新和成效，也要回应存在问题和时代新要求，进而使新型政党制度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理论叙事：凝练核心概念增强解释力

一般的“讲故事”不一定是学术话题，但“讲好中国故事”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讲故事”，是在国家和民族层面上基于自我认知进行自我描述和自我表达，是关于道路、制度、价值、形象等问题，因而成为学术话题。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历史叙事，需要立足实践前沿的生动诠释，还要有自主知识体系和学理支撑，才能增强解释力，使叙事令人信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制度发展和演进自然不是靠沿用西方政党理论；西方政党理论也不能很好解释中国政党活动。新型政党制度蕴含领导核心、民主参与、合作共治等价值，以独特的政党

治理逻辑，丰富了政党政治理论与实践，开辟了政党政治的新形态。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叙事，重在凝练核心概念和基本价值，用基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场景的理论框架讲述执政党的领导制度和多党合作的协商机制。

政治概念在知识体系创造、知识交流和传播中有着重要作用。研究者发现，“要形成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不能只靠观察，还要开发和提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概念”^[9]。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伟大政治创造，如果不能用自己的话语构建出学术话语，不能自己界定出概念内涵，不能在知识生产层面展开与全球学术界的对话，就很难将中国制度的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很难讲好讲清中国故事。“新型政党制度”这一理论概括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超越了“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分类标准，赋予政党政治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不同于西方叙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百年大党，而且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不仅是纲领性政党，而且是使命型政党；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叙事，要讲清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新型执政党，还要讲述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以及无党派人士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政党是政党制度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深化对多党合作中领导党、执政党、参政党内涵的认识，其理论意义是通过梳理和归纳中国政治现实中的事实性概念，为政党制度理论创新奠定基础。”^[10]过去我们关于政党、政党制度的相关知识体系一直处于外向型学习的过程，新型政党制度以理论形态出场，要求对政党的概念作进一步界定，以解决研究、交流、传播中的困难。

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叙事，需要基于制度运行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表述，构建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在新型政党制度中，“政治协商”

概念由来已久，成为比较成熟的政治参与形式，并且嵌入中国政治体系运行过程，实践中展现了明显的增量轨迹。政治协商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独有的现象，应该成为标识性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如何从理论的高度阐述其中的逻辑性？这就要充分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根基恰恰在于如何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那种将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视作具有同样属性和作用的多元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倾向引入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11]。加强政党理论研究是深刻揭示中国道路发展规律、中国之治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刻把握中国政党制度内在特质、世界政党政治演进趋势、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潮流的现实需要。无论是以大历史观系统审视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基本历程，还是以全球史观整体把握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实践及其经验教训，政党理论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切口、线索和领域，以政党理论研究为视角也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思想史、运动史、制度史以及话语史的融合。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才能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在“世界政党政治新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的有机统一，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因此，阐释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核心理念是重要的理论问题。”^[12]民主有其共性，即基本的价值取向，如主权在民、多数原则、平等基础上的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等。但基于现实的民主实践是多样的，人们对民主模式的探索远没有终结。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民主模式

的选择要考虑多种因素，既要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理念的结合，又要实现发扬民主与整合社会的统一，还要做到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协调。中国政治发展只能循着自主的、渐进的方向发展。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没有民主不行，没有有序的民主也不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既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资源。

在坚持以中国问题和中国叙事框架为底色的同时，也不应排斥西方经验和西方知识体系，要坚持交流互鉴。吸收包括西方在内的先进国际传播经验和成熟知识成果，有助于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具有共同价值基础、能被广泛接受的叙事逻辑。

四、交流叙事：通过交流对话提升传播力

交流叙事是经验的分享与共享。人们发现，在同一文化环境中，大家形成的共同知识背景会成为交流的共同基础，交流比较顺畅。而跨文化交流，则会因为细节、观念、制度等各方面差异，出现难以理解甚至交流无力的困境。我国一直强调尊重差异文化主体地位，在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的同时，需要“建构具有对话性的中国形象”^[13]。在政党交流方面，近年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中亚政党论坛等活动为各国政党增进信任、加强交流与合作开辟了良好开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论述现代化进程中政党责任，提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很好地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意蕴，传播了新理念，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责任，获得了广泛赞誉，赢得了更多理解。一些国外政要认为，“政党高层对话会为世界各国政党分享治国治党经验提供了一个开放平台”^[14]。

交流叙事要解决好“传-受”偏差问题。在交流叙事中，叙述者希望获得积极的交流效果，

而接收者在理解叙述内容和意图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做出相反或偏离性反应，从而使交流不能获得应有预期。在涉及中国政党制度的国际传播方面，由于西方社会对民主、政党政治话语权的垄断，以及我们对政治发展缺乏积极主动的叙述意识和能力，总是面临如何向国际社会讲清楚中国式民主和政党制度的难题。从我们自身的角度，需要在叙事方式上加以改进。过去我们习惯“晓之以理”，但中西方毕竟存在意识形态以及价值体系的巨大差异，各种复杂因素导致的误解、误读，使西方受众对中国故事接受程度有限，传播效果未能达到预期。如果我们更多地通过“动之以情”，以形象塑造和情节勾连展开叙事，既有大视野也有小切口，既有宏大主题也结合一人一事一物，能够让中外受众听得懂、能接受，则有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价值认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结构、价值、功能等方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其政治优势既要由执政党讲述也需由参政党讲述，讲清楚中国政党制度是一党执政但并非一党制，是一党领导但有多方参与。要支持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各种平台、各个渠道正面发声，讲述多党合作好故事，营造良好的社会影响和国际舆论氛围。

交流叙事应展现开放态度和对话姿态。在传播中国声音的过程中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探索中外交流叙事的新模式，着力提高中国形象亲和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是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我国自2013年开始举办具有智库特色的“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旨在增进中外之间的相互了解，搭建交流对话平台。会议主题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到“世界百年变局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变局下的中国新作为——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命运共同体”，参与者包括世界各国政界、学界、商界代表。通过这个平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识到读懂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共产党才

能读懂中国的发展。2021年推出的《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融媒体产品，探索主流媒体“自我叙事”与在华外国人“他者叙事”的共现，并在Youtube、Twitter等海外主流新媒体平台同步投放，拉近了与海外受众之间的距离，影响外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态度，提升了传播效果。近年来，世界各国重视从不同视角了解中国、记录中国、传播中国，更多人从观察、记录中理解了中国人的情感、中国的制度和中国的发展，沟通效果发生着良性的变化。

一直以来，我国政党制度领域话语多重性比较突出，既有政策语言、政治语言，也有学术语言，存在政策领域、研究领域、实际工作领域各说各话的情况。基于这样的现状，如能加强系统性建设，将多元主体以多种叙事方式在不同场域的表达通过传播战略整合为复调叙事话语，将有助于形成广泛参与的传播新格局。以多元叙事主体、多元叙事载体破解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单一、刻板印象，新型政党制度的传播也能从政界、学界、业界关注的话题走向“破圈”，吸纳多维圈层、多个领域参与，在增强主体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同时，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 张容南. 叙事的自我：我们如何以叙事的方式理解自身[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97.
- [2] 怀特. 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 董立河，译. 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54.
- [3]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21-12-02(1).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
- [5]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
- [6]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独特优势[N]. 人民日报，2022-

- 08-17(2).
- [7] 张惠康. 参政党功能与落实科学发展观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8: 101.
- [8]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及相关党内法规学习手册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1: 109.
- [9] 海伍德. 政治学核心概念 [M]. 吴勇,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5.
- [10] 崔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概念与政党建设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5): 36.
- [11] 柴宝勇, 石春林.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基础性建构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2): 71.
- [12] 《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 (2022-2023)》发布 第二届“世界政党政治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嘉兴学院举行 [EB/OL]. (2023-12-10). https://www.col.cn/zhejiang/zhejiang_news/202312/t20231210_2547745.shtml.
- [13] 张毓强, 于运全. 从形象到战略: 中国国际传播观察新视角 [M].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22: 48.
- [14] 海外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 [EB/OL]. (2017-12-03). <http://news.cctv.com/2017/12/03/ARTIRMTbuAlZeidx5ZJb6fY171203.shtml>.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结构、过程与功能

张霞

摘要: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系中独特的政治组织,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政治共识对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增强政治信任和合法性,促进重大公共决策的制定和顺利执行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政治共识如何在政协凝聚起来这一问题展开,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的逻辑分析框架进行探讨,认为静态结构是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赖以形成的基础,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双向动态运行过程实现共识凝聚,对我国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产生重要功能。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促进了我国政治体系的稳定、融合,有利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利益综合,有利于增强政策认同,促进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关键词: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结构;过程;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1]。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辟“中国之治”的重要制度设计,是理解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平台。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以协商凝聚共识的政治优势。

一、理论分析框架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是人民政协在形成和凝聚政治共识的过程中,相应的结构和功能

发挥作用的过程及作用机理,也即凝聚政治共识的有规律的模式和路径。基于此界定,通过借鉴吸收结构-功能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运用于分析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形成本文“结构-过程-功能”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结构功能主义源自20世纪初的结构主义,起初用于社会系统研究。伊斯顿对其进行批判借鉴,应用于政治研究领域,把政治生活理解为政治系统与社会的互动,是“社会性要求输入→政治系统转换→输出至社会→反馈”的过程。他用系统分析来鉴别政治生活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将政治结构理解为“政治关系”^[2],进一步深化了结构

收稿日期:2024-01-15

作者简介:张霞,江苏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主政治。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创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程和经验研究”(22CDJ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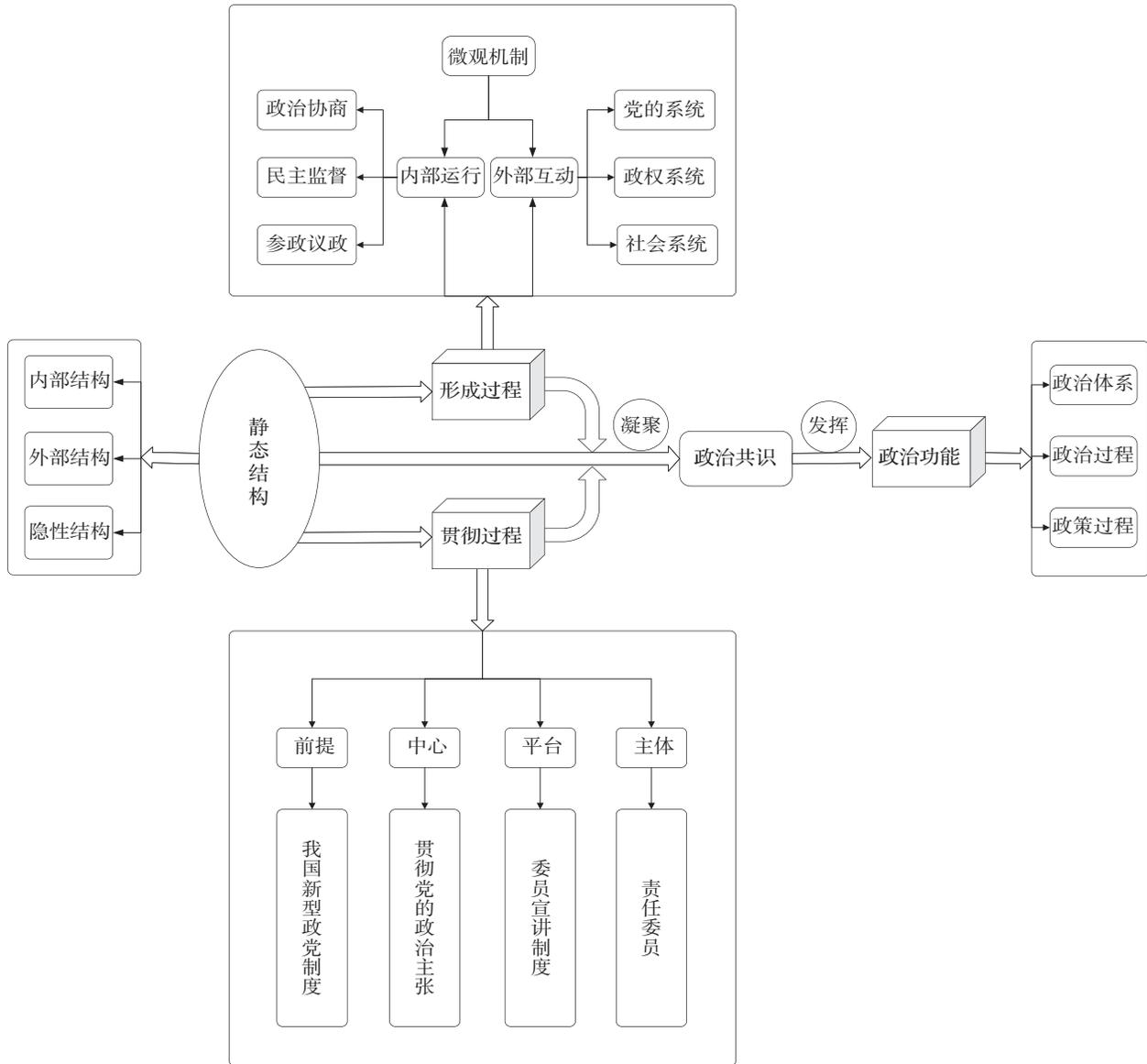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分析。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为政治学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摒弃“原子论式”的研究，有助于对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综合性分析。随着行为主义的日渐兴起，结构功能主义遭到不少学者的诟病，他们认为该分析方法偏静态而忽视动态、偏宏观而忽视微观、偏均衡而忽视冲突。但实质上，结构功能主义并不否认冲突，也不排斥过程和行动，只是理论工具分析的侧重点不同。鉴于此，有学者提出链接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的

“结构-过程”范式^[3]。

政治过程理论开启了政治学动态分析的先河，主张政治分析的主要内容为政治过程，扩展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分析。20 世纪初，本特利最早提出政治过程的分析概念，并出版了以此为题的专著，但学界关注和讨论较少。20 世纪 50 年代，杜鲁门《政治过程》的出版，开启了过程研究的先河。我国对政治过程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专章论述了政治过程，

认为政治过程适用于对开放政治系统的研究，主要是对功能和行为两个过程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末，胡伟的《政府过程》与朱光磊的《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开启了政治过程的本土化研究，对我国政府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该研究理论突破了1800年至1950年主流的“法律-制度”静态分析范式，开始重视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现象、行为的研究，以及对政治运作的关注。正如阿尔蒙德所言：“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4]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一书中，他对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进行了完善和拓展，认为：“需要用动态发展的方法来补充结构功能方法，因为我们不仅想知道政治体系是如何发挥功能的，同时还想知道为什么。”^[5]政治过程研究一改传统对固定结构和正式机构、制度的研究，注重研究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这一研究方法展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经由“输入-转换-输出”循环互动的动态过程，注重对事物的动态研究，通过动态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综上，本文通过借鉴吸收结构-功能理论和政治过程分析方法，从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过程相结合展开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分析，进而厘清其对我国政治体系的功能。

二、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结构

静态结构是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赖以形成的基础，机制必须依赖一定的结构才能起作用。从人民政协内部结构、外部结构和隐性结构三个层面分析，得出人民政协的制度架构和组织结构的出发点是朝着凝聚政治共识的方向设置的。

（一）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内部结构

人民政协内部结构包括组织和人员结构，形成以“会议”为轴心，以常设机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为依托的组织结构和以政协委员为主体的人员结构。人民政协组织结构具有上下同构、横向受同级党委领导、纵向间指导与被指导的特征，人民政协自身的组织结构是朝着凝聚政治共

识的方向所设置。上下同构即各级政协组织的组织结构设置和性质职能相同，横向各级政协都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两者结合共同确保了人民政协组织的统战性、统一性。个人角色是政治结构的基本单位，委员是政协组织的微观细胞，构成人民政协的角色结构。政治角色是政治过程的基本元素，是政治行为产生的主体因素。首先，政协委员具有联系面广的特征，政协委员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行业；其次，政协委员以界别为纽带，具有超越部门、地区利益的立场中立性，这使得他们在参政议政过程中能够提出客观公正的建议；最后，政协委员代表性较强。这三方面的委员角色特性，直接影响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政治行为过程，进而影响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的凝聚。

（二）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外部结构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的凝聚除受内部结构的影响外，也受到外部结构的影响。作为政治组织，人民政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小的政治系统，在自身系统内有相互间的结构影响和政治运作。但同时，人民政协又是我国整个政治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会受到整个系统中其他政治机构和组织的影响，并与之产生相互作用。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的凝聚是在与党委、人大、政府等互动作用中实现的，是一个整体的运作系统。人民政协的外部结构在领导力因素、执行力因素和基础性因素方面提供了协调和配合。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外部结构的保障因素，为其提供重要的方向指引。人民政协虽然不是权力机关、不是立法机构，但可以通过履行职能影响国家政权机关的运作，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人民政协与人大有相似的组织架构设置，人大和政协在区域和党派构成方面实现了互补，在代表构成方面实现了条块结合。政协活跃于政府行政的整个过程，是连接人民和政府的重要纽带。政府无论是在制定决策阶段还是在决策执行阶段都需要听取政协的意见建议，确保决策的科学化、

民主化，防止决策执行跑偏，确保决策执行效果。

（三）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隐性结构

协商文化是影响政治共识的持久性因素，可能在制度和体制变革后仍有影响。作为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隐性结构，协商文化从精神内核、培育过程到作用影响，对政治共识起到支撑和正向推动。我国协商文化根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在协商实践过程中孕育形成的，是不同主体间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具有“主体多元性，以协商、讨论等为参与方式，目的是实现合作”^[6]。协商文化是一种多元主体的参与型文化，对参与主体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提倡不同意见的发声。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的前提也是对异质性的包容，否则就变成政治同质，而不是政治共识。协商文化内含的偏好转变的价值内核、平等沟通的参与方式及追求理性和公共精神的特征与政治共识的价值理念、实现方式相吻合，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在协商文化场域中得到正向推动。

三、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过程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的凝聚不是单向度的过程，而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向度结合的运行过程。不仅包括各界别代表通过自下而上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在人民政协经综合以提案或社情民意形式影响党委和政府决策，而且人民政协还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贯彻至各界别代表，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解决分歧、化解矛盾，实现政治共识的凝聚。

（一）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形成过程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的形成主要是通过自身内部运行过程和外部互动过程实现，包括内部的协商、监督和参政议政过程及人民政协与政权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互动，人民政协“座谈会”机制、大会发言机制和提案机制是促进内外部运行的微观机制。

1. 内部运行过程

政治共识的达成是基于偏好转换，而不是偏好聚合。在偏好聚合的情形下只能形成少数利益

服从多数利益的结果，而偏好的转换则是经过平等的公开讨论和协商形成共识。人民政协通过协商机制实现不同界别群体偏好的转换，提供了一种政权外利益表达与整合的有效机制。在利益复杂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仅靠政权内的利益整合渠道不能囊括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缺失政权外的整合途径，这些被政权渠道忽视掉的利益诉求会集聚、爆发，偏离制度化的解决轨道，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过程有利于共识的实现，从政治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过程的开展到协商结果的办理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凝聚政治共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通过协商式监督，以改进和完善党委政府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以监督促合作、聚共识。人民政协参政议政过程通过调查研究机制和反映社情民意机制，一方面提供了利益表达的“内输入”模式，另一方面形成调研报告和社情民意“直通车”，以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从而经人民政协制度化渠道，在利益表达和政策反馈中解决分歧、化解矛盾，实现政治共识的凝聚。

2. 外部互动过程

人民政协的运行主要围绕党委中心工作进行，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政治组织运行。因此，人民政协与党的系统之间的互动是一种“领导-回应”的强关系逻辑。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协党组的组织机制实现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即通过组织嵌入（设立政协党组、机关党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人事安排实现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将各党派、各界别、各人民团体等所代表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经人民政协的合法化、制度化程序进入政治议程，将各界别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整合进党的决策议程中，并通过政协中心工作安排、职能履行等回应并落实党的领导。人民政协与人大的互动过程主要是在实现国家权力意志合法化的过程中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使得政协所反映的不同利益诉求能够经国家权力机关上升为国家意志。人民政协与政府的

互动过程实现了以协商逻辑对政府科层制行政逻辑中“负功能”的纠偏。在政策制定阶段，人民政协通过发挥调查研究、委员专家和协商优势，就涉及政策各环节问题积极建言献策，这有利于推动“共识型”决策；在政策执行阶段，通过发挥协商式监督促进政策有效落实，确保国家意志的执行和落实。

3. 微观作用机制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的内外部运行需要借助微观机制得到支撑。人民政协“座谈会”机制、大会发言机制和提案机制促进人民政协内外部运行，是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过程中赖以依存的微观机制。在我国政治运行过程中，“座谈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治理角色。“座谈会”机制是基于我国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及治国理政现实需求所形成的，以实现特定目标而开展的咨询讨论或传统沟通的微观机制。双周协商座谈会是人民政协中最具代表性的机制之一，是委员履职的重要方式，为委员与党政部门协商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双周协商座谈会规模小（通常为20人左右）、频率高，在最大限度激活了“座谈会”机制优势的同时，融合了人民政协协商议事的特色，以微观机制促进了政协职能履行以及与外部党政机构的互动。政协委员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建言资政，促进党政机构科学民主决策；同时，党政部门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宣介政策，经协商谈话机制争取各界代表理解支持，在协商互动中广泛凝聚政治共识。

人民政协如何有效实现参政议政，最主要的微观机制是通过政协各类会议中的“大会发言”机制。在会议中进行意见表达或交流的行为被称为“大会发言”，政协委员通过“大会发言”机制履行职能，可以说，“大会发言”是政协参政议政职能最直接的表达^[7]。大会发言过程看似是“单向”的过程，但实为双向互动过程。发言人在大会发言，是对自己所代表界别的观点的公开表达。发言人传达观点的过程同时是其他与会接收观

点的过程，接收者对该主题本身具有自己的认知，在听取发言者发言的内容后会形成意见互动，这有利于提高参政议政效率。

提案作为一项关涉政协全局性的工作，是履行三大职能的重要方式。提案工作的运行机制主要是由提案者、提案委员会和承办单位，经提案提出、审查和办理等环节形成的互动过程。具体互动运行过程为：提案者提交提案后，提案委员会根据立案标准对所接收的提案进行审查，符合标准的予以立案，同时对相似提案进行并案处理（对不符合标准的出具不立案通知，反馈至提案者）。立案后，根据提案内容确定承办单位（如涉及2个及以上，确定主办与会办单位或分办单位），由承办单位接收提案，经与提案者沟通协商、交换意见，形成体现各方意见的办理复文，反馈至提案者。协商民主贯穿提案所有环节，提案办理协商是提案工作机制顺利运行的保障，旨在消解提案办理过程中的信息偏差，增强双方之间的沟通联系，促进目标实现。

（二）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贯彻过程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是双向运行过程，不仅包括自下而上的政治共识形成过程，更关键的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共识贯彻落实过程。自上而下逻辑成立的前提是，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能够避免分歧，增进政治共识。

1. 中心：贯彻党的政治主张

通过人民政协将党的政治主张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下去，这样自上而下的过程与前述的自下而上过程相结合才是凝聚政治共识的完整过程。人民政协在贯彻党的政治主张过程中凝聚政治共识，政协党组是其贯彻的组织载体。政协党组通过“输入-转化-输出”机制和请示报告制度，实现将党的政治主张贯彻落实到人民政协具体工作中。一方面，在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基础上，使得党的政治主张和决策部署在人民政协中得到贯彻，在政协常委会工作中保证党的政治主张和决

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这一过程是政协党组通过与政协外部党的系统“输入-转化-输出”机制和在政协内部行使决策权来实现。通过民主程序，政协党组将党的政治主张转化为政协的决定，即党中央和同级党委的方针政策是输入端，经政协党组的贯彻转化为政协工作规划。同时，政协党组在政协内部通过行使决策权，对政协年度工作计划进行研究、审议提交政协各类会议的文件等，然后将其交由机关党组及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执行。综上，政协党组通过在政协内部决策权的行使和外部“输入-转化-输出”程序，实现了将党的政治主张贯彻落实到政协的运行过程中。另一方面，通过请示报告制度，政协党组定期向同级党委报告工作并及时请示党委有关政协工作中的重大工作安排，党的政治主张通过请示报告制度得以顺利执行，该制度是保障党的政治主张得以贯彻的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8]。在政协实际运行过程中，每年各级政协党组向同级党委作全面工作报告，并向同级党委报告其重要工作和有关要求的落实情况。通过请示报告制度，人民政协党组能够准确领会党委意图，将党的政治主张和决策部署落实到政协具体工作中；能够确保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使得人民政协工作始终围绕中心大局开展。

2. 平台：委员宣讲制度

政治沟通是“政治信息通过一定的通道进行交换与传递的过程”^[9]。宣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沟通机制，也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作为我国独特的政治现象，宣讲对我国政治生活的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沟通机制，宣讲具有明确的宣讲主体（通常为宣讲团）、特定的政治议题和自上而下的宣传机制。委员宣讲制度是人民政协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是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面向社会贯彻政治共识的机制化平台。人民政协通过委员宣讲制度将宣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沟通机制运用到政治共识贯彻过

程中。作为全国政协创新探索的一种履职方式，“委员宣讲团”制度确立于 2018 年。通过这一重要机制化平台，人民政协在新时代可以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政协委员通过该机制化平台，团结界别群众，进而面向社会传播政治共识。从政协的委员宣讲工作制度实践看，目前的委员宣讲方式主要包括委员宣讲团、委员讲堂、委员面对面、谈心谈话等。通过不同宣讲方式，政协委员能更好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到解疑释惑，化解政策贯彻落实中因偏差引起的矛盾，切实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落实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

3. 主体：政协委员

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基础性条件，是人民政协贯彻政治共识的执行主体。政协委员作为我国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政治角色，首要承担的责任是政治责任。“政协委员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是、履行职责。这是荣誉，更是责任。”^[10]政治责任即基于政治角色的主体应当履行相应的职责以及未履行好职责应承担相应处置，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人民政协通过从积极意义责任层面提高政协委员政治责任能力和消极意义责任层面强化委员问责考核，从而双向发力实现委员履职担责。政协委员在履职过程中通过委员联络机制——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实现了政治共识的贯彻落实。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一方面了解界别群众所需并反映他们的诉求，另一方面要将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与界别群众息息相关的政策宣传贯彻到位，起到答疑解惑、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党员委员既是党员又是政协委员，在发扬民主、合作共事等方面对党外委员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进而促进政治共识凝聚的形成。

四、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功能

政治共识的凝聚不仅依靠相应的结构，更重要的是需在动态过程中实现，同时在凝聚过程中

发挥相应的功能。在对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的结构和过程分析基础上，厘清凝聚机制对于我国政治体系的稳定和融合功能，对于政治过程的优化功能，对于增强政策认同和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功能。

（一）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对于政治体系的功能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具有促进我国政治体系稳定、融合的功能。

政治体系的两个重要方面，体现为冲突与同意。在冲突状态下必然会造成政治体系的不稳定，同意则意味着社会成员认同、信任国家政治体系，关涉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人民政协政治共识的凝聚，说明组成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别代表对党和国家政治主张的认可，对政权机构运行程序的遵循，对决策制定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和决策执行结果的同意。这一系列的反馈不仅是我国政治体系运行产生的效果，同时也是政治体系作用客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反映，是一种双向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行。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可以增强政治体系横向各机构间的沟通联系。例如，人民政协的提案和建议案，政府需要办理回应。对于政协提案的问题通常不是某一部门能够单独完成，这就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打破了各行政部门间因职责划分导致的行政壁垒，增进部门间的分工协作，以政协提案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实现整体化、系统性治理。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可以优化政治体系的纵向运行。在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环节，人民政协充分吸收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等的诉求，在政协内部经利益综合形成提案或建议案，上报至同级党委或政府；在自上而下的党和国家政治主张贯彻落实中，在各级党组织、政府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政协一方面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确保政府政策执行不跑偏，另一方

面发挥各专门委员会和委员联络制度，将党的政治主张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所联系的界别群众中。在横向纵向的互动过程中，人民政协连通了各组织间的协作，实现了对我国政治体系的融合。

（二）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对于政治过程的功能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有利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有效实现利益综合。

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首要环节。最大限度化解矛盾、凝聚政治共识的前提是，让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够表达出来，能够被听到。利益能够被准确表达一方面离不开表达渠道，特别是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另一方面则是利益表达主体有意愿有能力进行利益表达。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通过为体制外群体提供制度化参与平台和“内输入”利益表达两种方式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人民政协为各界别代表提供制度化表达渠道，弥补行政机关“块块”渠道的局限。同时人民政协提供利益表达的“内输入”模式，即政协委员通过调查研究、考察、委员联络、反映社情民意等途径，主动发现和准确反映所联系界别群体的利益诉求，有效解决部分群体不愿意或不敢进行利益表达的问题，最大限度使所有群体的利益得到真实有效表达。

利益综合是“把各种要求转变成重大政策选择的功能”^[1]。人民政协在利益综合过程中发挥了组织化、系统化的作用，使得不同群体的利益能够通过政协平台被关注，不同利益个体可通过政协委员的代表作用参与到利益综合过程中。同时，政协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别代表实现更高层面的利益综合提供了专门的组织协商平台。各民主党派可以直接向中共党委提出建议，也可以通过人民政协与其他党派协商讨论，在政协内部形成提案或建议案，形成利益综合，以政协提案的形式报送同级党委。或者，就专门性协商议题开展专题协商会，就特定专题开展协商讨论形成综合系统化建议。有学者指出：“各级

人民政协能够将社会各界分散的、不系统的利益要求转化为集中的、系统的要求,并将这些要求输送到共产党组织及政府之中。”^[12]

(三)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对于公共政策的功能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有利于增强政策认同和促进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在西方国家,政策制定是在多种政策方案中竞争择优的结果,理性选择、渐进理性等都是对政策现象的抽象概括和描述。我国的政策制定和形成不是竞争择优的结果而是协商达成共识的结果,政策制定过程具有显著的目标,即达成共识。“达成共识”是中国政策制定的目标诉求和显著特征^[13]。人民政协作为我国重要的参与性政策主体^[14],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联系广泛和专业性优势。一方面,可以使受政策影响的相关群体诉求在政策制定的调研和协商环节得到反映;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具有专业性优势。按照公共政策学的理论观点,公共政策的科学性离不开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中高级知识分子在人民政协中占很大比重,他们所提建议具有业务咨询的特点,且是一种“制度性的咨询”^[15]。同时,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经济界、农业界等界别更是由该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和佼佼者组成,概而言之,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能够从专业性角度对相关政策提出科学化建议。通过上述两方面的作用,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机制发挥了增强政策认同的功能。

从政策制定到政策落地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国家层面的方针政策通常是宏观的、全局的,带有方向性和指导性。到政策执行环节则必须具体且切合实际,从抽象到具体必须经过若干层级的分解细化,这个贯彻落实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政策目标偏差、执行受阻等困境,导致政策的失真性执行。人民政协通过各界别委员将方针政策精准贯彻落实到所联系的群体,讲明政策形成的复杂过程,使得他们真正了解方针政策的意图,增强他们对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

五、结语

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的最突出特色是在超大规模、超复杂结构、历史悠久的我国,提供了一种协商式共识形成机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民族、社会各界代表等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参与国家政治,形成软性约束共识。人民政协政治共识凝聚需要静态的结构支撑,更要通过动态的政治过程来实现,通过具体的组织架构和制度运行成功完成以协商凝聚共识的实践,并对我国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产生了重要正向功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8-39.
- [2] 伊斯顿. 政治结构分析[M]. 王浦劬,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7.
- [3] 吴晓林. 结构依然有效: 迈向政治社会研究的“结构-过程”分析范式[J]. 政治学研究, 2017(2): 103.
- [4][11] 尔蒙德, 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 曹沛霖, 郑世平, 公婷,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199、233.
- [5] 尔蒙德. 当代比较政治学: 世界视野[M]. 杨红伟, 吴新叶, 方卿, 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44.
- [6] 董学, 王洪树. 协商文化视野下公共信息资源交流平台建设[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7(2): 74.
- [7] 金安平. 协商民主中“大会发言”的机制与效率——基于全国政协全体会议的观察[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8(1): 11.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767.
- [9] 谢岳. 当代中国政治沟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7.

- [10] 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1.
- [12] 胡伟. 政府过程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106.
- [13] 陈玲, 赵静, 薛澜. 择优还是折衷? ——转型期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解释框架和共识决策模型 [J]. 管理世界, 2010(8): 61-63.
- [14] 黄天柱. 参与性政策主体: 民主党派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制度定位新探 [J]. 政治学研究, 2013(2): 23.
- [15] 曾勇明, 张士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过程分析 [J]. 政治学研究, 2011(3): 43.

责任编辑: 尔东

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 典型范式、存在问题与提升路径

——以江苏省为例

周 凯 曹济舟

摘要：顺应互联网发展新趋势新特点，做好网络统战工作，是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正能量网络人士作为网上正向信息内容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在舆论宣传引导、营造网络健康生态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本研究对正能量网络人士作了概念界定，并通过数据画像的方式开展正能量网络人士的筛选与识别，以 K-means 算法为主进行聚类分析，探讨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的特征。同时，通过在江苏开展的调研活动，归纳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中的典型经验范式，并梳理当前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正能量网络人士；网络统战；江苏

当前，各类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其立体化、即时性和交互式的沟通方式在改变信息获取途径的同时，也极大改变了受众表达观点的习惯。人们逐渐转至线上空间开展意见表达，其中部分见解独到、表达欲望较为强烈的网民群体有可能通过影响网络舆论等方式，成为网络空间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见人士。新时代的互联网已经成为凝聚共识的新空间、汇聚正能量的新场域、开展舆论斗争的新阵地，

引导和培养具备正能量潜力的网络意见人士，传播富有正能量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壮大统一战线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如何有效运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体谅包容、平等尊重、协商民主等诸多统战工作的思维和方法，注重对正能量网络人士的识别、培养与使用，成为统战工作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

收稿日期：2024-01-08

作者简介：周凯，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网络统战、政策研究；曹济舟，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量化分析、新的社会阶层。

作者简介：本文系 2023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江苏建设文化强国先行区实现路径研究”（23SYA-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正能量网络人士概念的界定

“正能量网络人士”中的“正”指向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承担社会责任，“能量”是指有专业能力、叙事技巧，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动员力，“正能量”表现为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情感、行为及正向影响力。学者们对正能量网络人士开展了诸多方面的研究。从传播学视角看，正能量网络人士是通过互联网传播渠道生产正能量信息、传播正能量内容，并具有较强活跃度和一定粉丝影响力的个体集合^[1]。从社会学视角看，正能量网络人士是互联网时代崛起的一个新话语阶层，是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网络人际结构的关键节点之一，正能量话语表达和积极身份认同是其影响力的重要来源，而这种影响力又反过来推动正能量表达公共空间的生成^[2]。从统战工作视角看，正能量网络人士是网络人士群体中的积极力量，他们“爱党爱国、有影响、有担当”，能够主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在支持国家治理、社会建设中能够表达出一些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建议，通过其话语的影响力引导网民的主观价值取向，最大限度地争取追随者，他们是通过群体效应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代表人士^[3]。

就统战工作而言，在网络意见人士中，那些在支持国家治理、社会建设中能够表达出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建议，通过其话语的影响力引导网民的主观价值取向，运用其特定的代表性最大限度地争取追随者，通过群体效应汇聚力量、凝聚人心的人，可称之为正能量网络人士。

二、正能量网络人士数据画像

打造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发现与鉴别正能量网络人士，这就必须通过数据画像的方式开展正能量网络人士的筛选与识别，进行精准定位，从而了解他们的特征、兴趣、价值观等方面信息。

数据画像是用于勾画目标用户行为模式、分析其消费习惯和需求的模型工具，通过海量数据抽取出用户基本属性、偏好等多维度信息，将信

息标签化，便于了解和分析用户的需求变化，从而进行精准分析^[4]。学者们对画像的构建方法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在构建层次上包括搜集用户数据、筛选符合业务需求的特定用户、数学建模、数据可视化等^[5]；在用户画像的应用层面上主要包括用户消费行为、用户兴趣偏好、用户人格特性与情绪研究等，主要运用于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用户服务，电子商务的用户个性化推荐和社交媒体的网络舆情监控、治理^[6]。依托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深度探究该群体的特性，增强对其认知的广度和深度，为战略设计和应用提供数据支持，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精确度。

本研究开展的正能量网络人士的数据画像，主要用于理解他们在统一战线同心圆中的角色，了解他们与其他网络人士的区别，以及揭示该群体的内在特性。研究团队先后赴南京、扬州等地开展调研，召开统战部门负责人和网络人士座谈会，向江苏地区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大V等群体发放调查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767份），对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进行了系统调研。

本研究根据自我认知、外部认知和驱动力三大指标，开展数据画像模型体系建构，设定了以下三个筛选性问题——你认为你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吗？你认为网络上缺乏正能量吗？你愿意传递正能量吗？在答案均为肯定时，将该样本判定为正能量网络人士。这种划分方式旨在提供一个全面且精细的视角来理解和描绘正能量网络人士群体的整体特性，从而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提供基础。为此，本研究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经济特征和价值观特征三大一级指标，进一步设计了12个更为详细的二级指标，如性别、年龄、对未来的预期等（见表1）。

本研究应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中的K-means算法进行聚类分析，初步将网络人士分为“正向网络人士（76.88%）”和“其他网络人士（23.12%）”两类。其中56.81%的“正向网络人士”通过筛选性问题被判定为正能量网络人士。因此，

表 1 数据画像模型设计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正能量网络人士 内部画像	人口统计学特征	性别
		年龄区间
		文化程度
		职业分类
	经济特征	收入水平
		是否拥有住房
		是否拥有汽车
		工作是否稳定
	价值观特征	政治面貌属性
		对工作的满意程度
		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对未来的预期

本研究进一步将网络人士细分为：正能量网络人士（56.81%）、中立网络人士（20.07%）和其他网络人士（23.12%）。关键指标为 P 值 <0.05 的自我认知和驱动力，这两项指标在形成正能量网络人士特征中起关键作用，是构建该群体的重要因素。相对而言，外部认知在该过程中作用不显著。

通过问卷所得数据分析，正能量网络人士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以中年男性为主体，青年比例较低，21 岁至 30 岁的青年群体占比仅为 12.30%。这表明青年群体对于“正能量网络人士”这一概念的认同度和参与度相对较低，未来需要强化青年培养和引导。二是文化程度较高，信息来源丰富。正能量网络人士多精通互联网工具和技术，具有丰富多元的信息获取渠道，在网络信息的筛选、处理和传播方面具有优势。三是经济情况稳定，生活状态积极。89.70% 的正能量网络人士的年收入超过了他们所在地区的平均水平，对生活状态满意。良好的经济、生活条件有利于其积极参与网络社会活动，传播正面信息。四是以党外人士为主，具备一定的身份自觉。73.30% 的正能量网络人士非中共党员，他们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有明确的自我认知和责任意识，对未来发展保持乐观态度。

数据画像分析还反映出其他一些特征：正能量网络人士占总体样本超半，显示出积极的队伍建设趋势；群体比例呈“两头多，中间少”的沙漏形态，突显出网络人士间的观念分化和对立较为严重；自我认知和驱动力作为内生因素，是构建正能量网络人士的关键，外部认知影响较小。这些特征提示在未来统战工作中，应强化对网络人士心理价值的积极引导，深化正能量理念的内在认同，扩大正能量网络人士群体规模。

三、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典型范式

为深入了解江苏省在网络人士队伍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挖掘和总结典型案例，本研究开展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的调研，在江苏调研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典型范式，了解江苏地区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的现状和特点，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总结在网络人士队伍建设方面的创新举措和有效方法。江苏的主要经验做法如下。

（一）政治引领绘就思想底色

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落实基层党组织的主体责任。例如，扬州市江都区在开展网络统战工作中，将该工作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党群服务中心融入网络统战元素，强化与公安、网信、商务等相关部门协作，建立网络统战工作联席制度和网络人士数据库，与应急、网信、公安等部门实现网络舆情数据共享，把相关事项有针对性地分类转化为统战工作任务。充分融合各类网络平台，以新联会为抓手，把思想引导和网络特色相结合，进一步以网聚人心，增强思想共识。以商贸城社区直播电商基地、双华村拓圃电商直播平台为重点，打造网络统战人士示范基地。支持有条件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党组织设立统战工作机构、统战委员等，充分运用网络平台服务市场主体，引导企业家自觉进行企业数据合规建设。通过政治培训、主题教育、国情考察等形式，加强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解读力度，帮助网络人士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提高参与意识形态斗

争的能力和水平。联合网信部门召开全区互联网行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座谈会，积极推进“学说做”活动走深走实。建立党员领导干部与网络人士列名联系制度，定期分析研判思想动态，通过专题研讨、集中宣讲等形式引导广大网络人士唱好主旋律、画好同心圆。

（二）平台载体架设沟通桥梁

积极搭建平台、拓宽渠道、创造条件，鼓励网络人士多生产和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网络内容，更好占领网络舆论阵地，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定。发挥相关网络社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倡导行业遵循市场规律、获取正当利益，实现行业自律自治、自我净化。建立健全网络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推动形成向善向上的良好风尚。其中，“苏大强”网络话题的设置与拓展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苏大强”网络话题是“江苏大家都很强”的简称，这一网络话题的设置是借力影视作品进行创新传播。电视剧《都挺好》播出后，剧中角色“苏大强”频频成为网络热搜。该网络话题推出后，江苏自媒体联盟组织网友在互联网上全面宣传普及江苏正能量，以“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为主旨，推出系列话题“苏大强”“苏大富”“苏大美”“苏大高”，逐步形成以“苏大强”为核心的系列网络话题矩阵，并产生了强大的品牌效应。此后，广大网友创造性地使用“苏大强”子话题。例如，公益江苏用“苏大爱”，惠民江苏用“苏大惠”，交通江苏使用“苏大路”“苏大桥”“苏大航”“苏大港”“苏大运”五个子话题，江苏书法界、读书会使用“苏大书”，画家用“苏大画”，等等。这些子话题通过不同维度和层面诠释了“苏大强”究竟“强”在哪里。截至2023年7月上旬，“苏大强”网络话题全网阅读量累计超过127亿次，网络话题矩阵子话题超过100个、超级话题7个，参与使用“苏大强”话题创作传播的网络IP地址已经超过107万个，形成了强大的传播效应。

（三）特色活动发挥带动效应

通过举办特色活动，激发网络人士的使命感

和荣誉感。发挥网络带动效应，引导网络人士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助力生态环保，发挥专业优势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事业赋能。鼓励网络人士利用拍摄短视频、视频直播、网络众筹等方式，打造网络公益活动品牌，带动广大网民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共同促进共同富裕。以小灿灿新媒体公司为例，公司秉承“利他向善”的价值观，致力于开展公益项目，以新媒体思维赋能公益传播、服务社会。2019年以来，开展大型社会公益项目“蒲公英计划”系列活动，如关爱自闭症儿童成长与就业的“听见你”、聚焦帮扶弱势儿童群体的“看见你”“灿心向善·7乐无穷”“宁墨同心-灿烂星光少年行”等。与政府部门合作正能量传播项目：“八戒说车”与江苏省公安厅合作拍摄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宣传片；“猴哥说车”与孝感市公安局合作拍摄宣传片，揭露二手车领域的常见骗局，助推反诈宣传；“说车的阿飞”与青岛市消防支队合作拍摄宣传片，展示消防装备，普及消防知识。

（四）培育网络正向传播力量

加强与网络自媒体的联系合作，帮助协调解决网络自媒体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大力支持网络自媒体在当地发展壮大。积极组织自媒体采风活动，建立健全媒体素材库，实现资源共享，相互取长补短，引导网络自媒体与当地政府保持同频共振。培养素质高、能力强的网络自媒体从业人员，精准引导网络自媒体融入当地中心工作、关注广大网民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使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而通过网络自媒体的宣传推介赋能地域发展。2023年4月，徐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专家委员会、网络安全协会以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影院共同举办了“奋进新征程、网聚正能量”主题活动暨徐州市网络人士网络安全专题培训班，有效增强了网络人士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意识。2023年5月，南京市溧水区委统战部、南京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以及南京市新媒体人士联谊会、

溧水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共同举办了“寻美南京·宁新助溧”南京新媒体人士溧水行活动，来自全市 50 多名新媒体人士和网络达人参观溧水、聆听溧水、品味溧水，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为溧水城市建设和美丽乡村宣传推广贡献智慧和力量。

四、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江苏对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的工作力度持续加大，省内各市统战工作已形成众多亮点。但从统战工作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在正能量网络人士的引导和培养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 人员构成复杂多元，亟须改变“游离子”身份

网络人士作为新的社会群体，主要由网络运维者（包括互联网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和网上发声者（在互联网上制造话题、发表意见的人）构成。但他们流动性大、分散性强、涵盖范围广、囊括的群体多且职业类别复杂。学术界对正能量网络人士尚未做出明确的概念界定，也没有实践中可供操作的分类标准，这些都导致“什么是正能量网络人士、哪些人属于正能量网络人士，以及如何开展正能量网络人士统计工作”等诸多事项的边界不清。网络身份具备虚拟性、隐蔽性，现实生活中的网络交流往往是以网名昵称的匿名形式进行。目前，统战部门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公安、网信等管理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但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存在难以掌握网络人士具体信息、难以有效联系网络人士、无法精准组织起来等现实问题。例如，关于网络人士的数据信息更新不及时，调查掌握不全面，特别是对网络人士人数、业务范围、经营发展情况等掌握不够翔实，难以实现对网络人士的动态把握，不易对有影响力的代表人士进行认定和管理服务。

(二) 沟通渠道有待完善，网络统战人才相对缺乏

网络人士规模发展迅速，网络代表人士、流

量大 V 在人口构成上以“新生代”为主体，其思想观念多元化，对新话题和热点话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往往游离于各种组织之外，既有的网络社会组织也较松散，存在“人难聚”“人难找”“人难统”的问题。目前，虽建有统战部门与多部门的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商机制，但部门间的信息共享、联系沟通、联动合作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高效充分，在网络人士引导的针对性、有效性上容易“虚化”，一些举措较难落地实施。同时，网络人士应用新媒体、新技术的水平颇高，与他们加强沟通联络需要具有统战知识、网络技术、沟通技巧、传播能力等。但当前统战干部的网络思维还有待加强，一些工作人员习惯于传统模式，一定程度存在“不想用”“不愿用”“不会用”网络统战平台和信息化工具的现象。具有丰富网络知识、能够熟练运用网络技术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人才相对短缺，网络统战专业人才配置机制尚未形成。这一定程度上造成网络统战工作平台覆盖率不高、内容不够丰富、功能形式单一、交互性不强等客观问题。

(三) 工作方法较为单一，依然缺乏“话语权”优势

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性，网络人士特别是内容创作者可能基于某个事件、甚至一句话就会引爆热搜，产生社会舆论焦点，这造成及时干预和管理方面的困难。思想引导内容和方式有待改善。目前针对网络人士的思想引导，仍然是以传统的联谊交友、课堂培训、现场教学、调研座谈、组织活动等为主，引导内容和方式缺乏亮点，亟须创新。一些党政部门的“两微一端”低水平低频率回复可能导致“政治冷漠”。网络人士普遍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前沿化特点，熟悉网络表达和技巧，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度、话语表达速度及参与度较高，但一些干部的简单回复、生硬回复或不回复，导致他们不再发声或转而通过其他渠道发声，这是出现一定数量“灰色网友”或“黑色网友”的原因之一。

五、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的提升路径

(一) 筑牢正能量网络人士线上阵地，持续点亮“科技树”

一是提升网络安全水平。随着 ChatGPT 等大型 AI 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运用，其使用成本低廉、技术迭代迅速等特征将导致监管困难等问题。对此，必须创新统战工作思维，充分利用 AI 的计算和学习能力，主动识别与追踪智能网络水军，提升舆情监管的精度与效度，最终提高对网络环境的监管与引导能力，有效服务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大局。二是提升危机干预能力。现有网络舆论危机通常表现为网民使用含蓄、象征、讽刺等方式隐晦表达负面观点，传统情感分析系统对此难以准确识别，会导致危机应对与干预的迟滞。充分利用类 ChatGPT 等 AI 在情感分析方面的优势，准确捕获网民真实情绪，有效降低高熵数据风险，进而提高舆情危机的应对速度，实现对深入理解网络环境中复杂情绪和隐含观点的有力支持，全面提升网络统战工作质效。三是完善智能疏导系统。面对网络环境负面情绪可能转化为现实社会冲突诱因的现状，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处理敏感和隐私信息过程中的较高说服力和可信度，提升网络人士对人工智能学习模型的信任度。积极使用类 ChatGPT 等学习模型，全天候在线提供情绪预测、心理疏导等个性化、可信赖服务，将矛盾化解和心理疏导任务前置，确保网络统战工作顺利进行。

(二) 构建正能量网络人士评价指标，精准勾勒“坐标系”

一是开展动态筛选评价。探索完善现有正能量网络人士的动态筛选评价机制，持续有效获取正能量网络人士样本素材。研究确立正能量网络人士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相关量化方法进行系统性评估。在动态获取网络活跃人物的基础上，依据指标体系，运用自然语言分析方法，分析相关人员情感动向，计算“正能量得分”。随后运用 K-means 聚类分析方法对正能量网络群体进行

分类，并结合 AI 技术对网络人士的画像特征进行精确描述。二是有效激发社会活力。依据正能量网络人士的差异特征开展分众化引导。具体来说，党委政府和主流媒体要针对各类别正能量网络人士的差异，结合不同热点事件，转发点评具有专业经验的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论，更好发挥不同类型网络意见领袖对不同舆论的引导作用，激发更多的网络人士在网上传播正能量。三是积极树立、宣传先进典型。建立正能量网络人士的人才储备管理系统，实现对正能量网络人士的动态追踪反馈，加强对正能量网络群体的综合管理。各级党政部门积极与正能量网络人士开展互动交流。积极发挥正能量网络人士的意见领袖作用，引导网络话语生态健康发展。四是构建多级传播矩阵。积极推动正能量网络人士多渠道设置议程，促其构建集微博、微信、网络社区、短视频等平台于一体的多媒体传播矩阵，打通话语传播空间边界。开辟正能量网络人士“中央厨房”，打造正能量媒体中心板块。依据不同的正能量网络人士类型，多渠道、分众化地进行正能量议程设置，引导大众关注正能量话语。

(三) 加强正能量网络人士识别，持续扩大“同心圆”

一是建立数据收录系统。利用大数据开展信息搜集与筛选工作，对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有影响力的网络人士，按照年龄、学历、职称、所属领域分类建库，并定期调整更新，形成吸纳正能量网络人士的常态化机制。二是开展联合选拔培养。统战部门与网信部门、群团组织、重点互联网企业加强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统筹协调，做好信息通报、人才培养工作。健全完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列名联系正能量网络人士制度，加强联谊交友。建立健全网络意见人士推荐考核机制，培养有序参政的积极力量，引领网络意识形态新风尚。三是扩大参与成长渠道。围绕一些正能量网络人士缺乏影响力、难以辨识的现状，支持其形成网络社会影响力。加强正能量内容的及时更新和

动态呈现，改进正能量网络人士信息发布模式，通过增加推送信息供给等方式，有效提升正能量网络人士的社会关注度和网络用户黏性。

（四）强化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培养，协力打造“新力量”

一是织密组织体系。在各地互联网行业党委领导下，根据正能量网络人士实际情况，积极推动属地互联网企业、新媒体平台、社会组织成立基层党组织，明确统战工作职责，加强统战工作业务培训，以有效带动正能量网络人士增强政治认同感。加强“组织起来”，推动条件成熟的地域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网络人士分会、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等，通过健全章程、规范运作，实现自我管理、服务和监督。二是统筹人才培养。统筹党政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智库等力量资源，优化完善人才发现、培养、管理、激励机制，把政治素质好、专业造诣深、社会影响大的网络人士及时纳入重点联系对象，积极打通部门与数据壁垒，增进跨部门交流合作，加强培育选拔，强化集智聚力。打造新媒体负责人、党外网络评论员、网络宣传员骨干队伍，共同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积极做好有关正能量网络人士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提名工作，搭建参政议政平台，畅通意见建议反映渠道，满足其合理政治诉求及愿望。三是优化平台建设。加强线上网络阵地建设，结合“两微一端”平台特点，用好网络话语体系，密切与网络人士线上线下沟通交流。强化政府、企业、社会、网民联系互动，依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试点城市和创新推广城市，以项目化方式打造正能量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创新示范点，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五）发挥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优势，打造意见“风向标”

一是发挥专业优势。精准研判各专业领域、媒介平台正能量网络人士的特长与表现，鼓励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员在其擅长领域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有效影响网络舆论。

围绕当地发展战略及中心工作，定期组织正能量网络人士参加专题协商、座谈交流等活动。有效拓宽网络人士知情明政、建言献策渠道，积极推进网络问政，有效发挥网络智库正向引导作用，及时开展意见征集、网上调查活动，服务科学民主决策。二是丰富产品供给。弘扬网络正能量需要兼顾不同层次受众对形式及接纳方式的喜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的传播技术带来的算法推送、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等传播形式细化内容供给，增强受众互动体验。充分了解和把握不同受众群体精神需求的发展规律，创作满足不同群体精神需求的正能量文化产品。根据不同群体差异化需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鼓励正能量网络人士有针对性开发理论教育类、文化浸润类、榜样引领类及警示教育类等多样化文化产品，推动正能量网络人士更好弘扬社会正能量。三是参与民生服务。依托大统战工作格局，推进统战工作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探索“互联网+”新模式，建好正能量网络直播等传播矩阵。因地制宜开展多样化为民服务，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医疗、教育、养老、环保及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热点问题，推动网络人士健康成长和服务民生互促共赢。

（六）强化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的政治保障，筑牢发展“压舱石”

一是强化党的领导机制。建立健全分工明确、协调有力的工作机制，努力构建网络化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发挥各级党组织主体作用，把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纳入党建工作的总体规划、培训内容、目标考核，推动各级党组织将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将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纳入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考核要点，加强网络内容治理与监管。二是搭建舆情应对机制。引导正能量网络人士充分把握社会关切议题，将回应舆情热点的情况作为正能量网络人士统战工作重点考察内容。相关部门建立舆情预警机制，最大范围收集社会最为关切的话题，总结舆情波

动规律，提升舆情准备与回应能力。三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正能量网络人士队伍建设工作纳入各级党委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完善奖惩机制，对工作优异、表现突出的正能量网络人士给予物质和精神鼓励，激励其成长进步。

参考文献：

- [1] 郝丽. 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策略重构[J]. 中州学刊, 2021(6): 21-25.
- [2] 张卫, 后梦婷, 张春龙.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网络行为特征及统战工作方式研究[J]. 江海学刊, 2019(2): 125-131.
- [3] 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关于正能量网络意见人才培养的调研报告[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2): 48-50.
- [4] 许奕锋. 正能量网络意见代表人士的引导和培养机制研究[J].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2): 40-45.
- [5] 王宪朋. 基于视频大数据的用户画像构建[J]. 电视技术, 2017(6): 20-23.
- [6] 刘海鸥, 孙晶晶, 苏妍嫒, 等. 国内外用户画像研究综述[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8(11): 155-160.

责任编辑：吉强

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研究

——基于江苏省 C 市的调查

郭晓东

摘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新就业群体也随之出现。新就业群体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从调查来看,当前统战工作对于新就业群体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做好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需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按照“信任尊重、团结引导、组织起来、发挥作用”的思路,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基层治理水平,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提供力量支持。

关键词: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新业态;江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2]。新就业群体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随着互联网经济和社会消费升级,新就业群体日益成为灵活就业的“蓄水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基层社会治理的“稳定器”。如何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有序有效地把广大新就业群体组织起来,加强引导、发挥作用,巩固

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统战工作一项新课题和新的发力点。

一、新就业群体基本状况

与传统就业群体相比,新就业群体的人员构成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还有大量下岗人员、退役军人、自由职业人员以及部分高校毕业生,普遍具有“三低、两高、一中”群体特征。

(一) 年龄比较低,趋于年轻化

从调查来看:新就业群体的年龄以 21 岁至 30 岁的“90 后”和“00 后”群体为主,占 47.8%;其次是 31 岁至 40 岁群体,占 31.2%;甚至还有 10.2% 的人年龄在 20 岁及以下,超过 41 岁的人只

收稿日期:2024-01-05

作者简介:郭晓东,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务处副处长,研究方向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共同富裕视域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研究”(ZK202102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占10.8%（见图1）。这种年龄结构意味着他们有活力，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比较强，也意味着他们对国情党情社情可能了解不够全面深入，对一些政策举措容易产生误解或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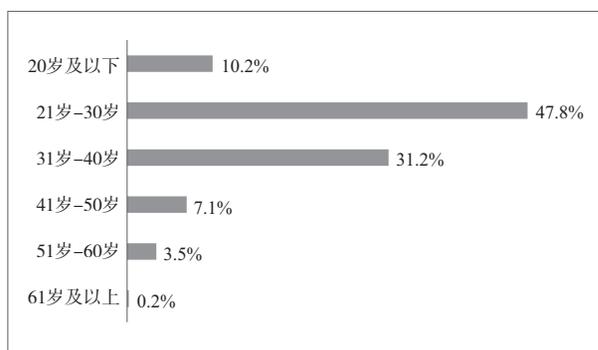


图1 年龄结构

（二）学历层次比较低，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不足

大部分调查对象仅仅是低层次的高中及以下学历，占57.3%；其次是大专学历，占28.6%；而本科、研究生等高学历的人仅占14.1%，他们主要负责平台企业的管理运营工作（见图2）。由于学历层次比较低，加上缺少时间和精力，很多人宁可闲暇时打游戏、刷抖音、追网剧等，也不愿意主动“充电”学习，导致他们的知识和技能难以适应社会需求，在市场竞争中经常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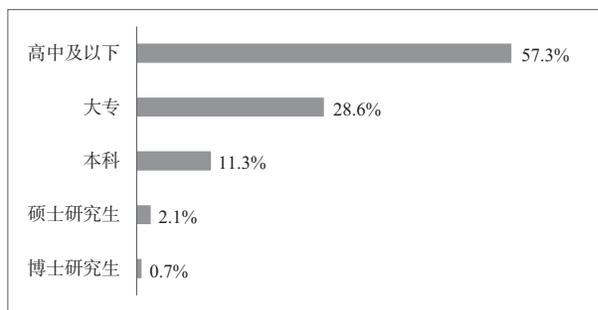


图2 学历层次

（三）党员比例比较低，绝大部分属于群众
从政治面貌来看：81.2%的调查对象是群众；中共党员比例只有6.3%；共青团员占10.4%；而

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更是凤毛麟角，仅占2.1%（见图3）。由于党员数量比较少，加之他们与平台关系相对松散，基层党组织覆盖有限，存在一些口袋党员、失联党员，难以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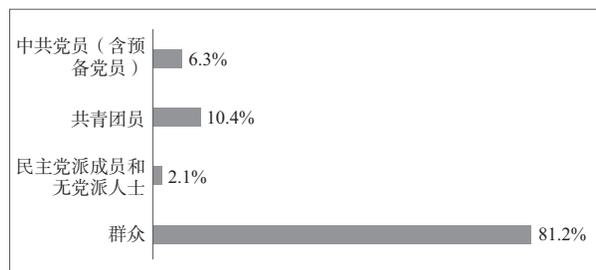


图3 政治面貌

（四）工作强度比较高，竞争压力大

52.7%的人每天工作时长在8小时到12小时之间，40.7%的人甚至超过12小时，只有6.6%的人低于8小时（见图4）。与此同时，相同或相似平台企业员工之间业务竞争激烈。有的网约车司机为了抢单，甚至经常吃住在车上。长此以往，不仅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影响他们的职业心态，这成为他们经常跳槽的重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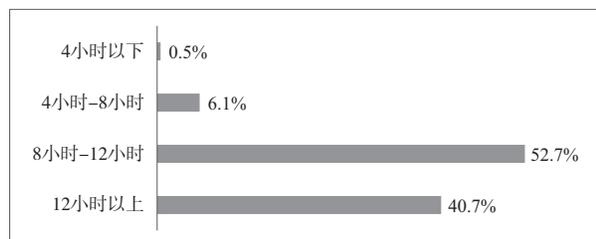


图4 日平均工作时间

（五）职业流动性比较高，工作不稳定

新就业群体主要通过“网上注册、平台派单、线下干活”模式灵活就业，职业稳定性比较差。从“就业以来更换工作的次数”来看，他们整体呈现较强的流动状态。其中，93.5%的调查对象至少更换过1次工作，31.5%的人更换过5次及以上工作，仅6.5%的人没有更换过工作，这主要是刚入职不久的职场新人（见图5）。职业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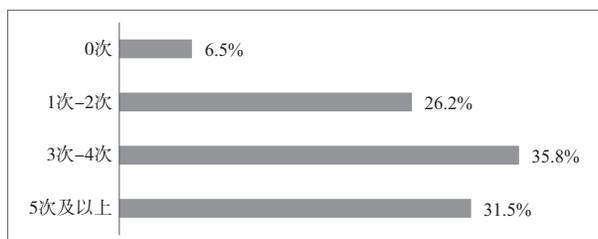


图 5 就业以来更换工作的次数

动性虽然是新就业群体受市场经济利益导向和竞争机制影响的一种自发行为，但对于统战工作而言，这不仅导致难以与他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情感纽带，而且会导致统战力量和统战资源流失^[3]，从而加大统战工作的难度。

(六) 经济收入大都处于中等水平，存在分化现象

从月平均收入来看，新就业群体大都属于中等收入群体范畴。其中，83.7%的调查对象在3000元至8000元之间，11.1%的人超过8000元，但也有5.2%的人在3000元内，属于低收入群体（见图6）。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月平均收入属于毛收入，扣除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必要生活开支外，剩余有限，他们有时甚至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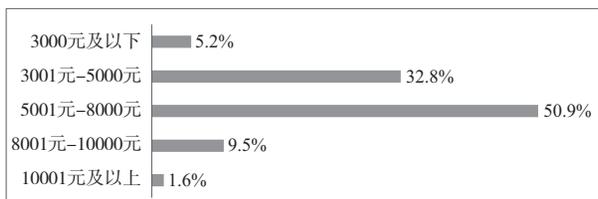


图 6 月平均收入水平

二、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基层实践

C市属于经济发达城市，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比较高，是新就业群体的集聚地，新就业群体总量约14万人，不仅数量多、分布范围广、职业类型全，而且社会影响力比较大。C市按照“统战工作对象聚集到哪里，统战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的思路，把新就业群体纳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范畴，积极探索新就业群

体统战工作新路径。

(一) 以专项协调机制为制度保障，形成工作合力

发挥统战工作“1+4”专项协调机制中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围绕“资源共享、工作共抓、活动共办、品牌共创”目标，以统战部门牵头组织协调、成员单位联合联动，实现“党建工作、统战工作、群团工作、行业管理、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一体化推进，不断壮大工作合力。同时，为加强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护，统战部门联合工会、人社部门等，以快递、外卖、网约车行业为重点，试点推进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头部企业或企业代表组织签订行业性集体合同。

(二) 以平台载体建设为着力重点，扩大覆盖范围

统战部门坚持抓党建和抓监管、管平台和管人群有机结合，根据不同行业、企业以及新就业群体各自特征，通过行业联建、区域统建、结对共建等多种方式，推动与新就业群体密切相关的各类组织应建尽建、全面覆盖。成立网络主播、外卖送餐、快递、道路货运、网约车5个行业党委，组建基层工会组织157个，建成快递、外卖送餐、运输、养老护理等市级行业工会联合会10个，区、镇级行业联合工会56个，累计发展新就业群体工会会员12万多人。

(三) 以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为关键环节，增强示范带动效应

一方面，在“育”上下功夫，强引领，聚共识。为广泛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组织开展“小哥说”“司机说”“主播说”等活动500余场次，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能够在新就业群体中及时入脑入心入行。通过打造“龙城先锋骑士”“餐饮监督员”“红色青果宣讲团”“龙城畅运青年突击队”“主播达人赛”等队伍，提高新就业群体中党员的影响力、号召力。另一方面，在“选”上做文章，树典型，做表率。在外卖配送员群体中开展“安全骑行、文明送餐”宣传以及“金骑士”“金

头盔”“最美骑手”评选活动，在货车司机群体中开展“三评两选”活动。通过先进典型讲好行业故事，传播行业好声音，积极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氛围，提升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可度和职业荣誉感。

（四）以服务帮助为有效抓手，凝聚人心力量

为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困难，统战部门发挥“统筹谋划、沟通协调、督查督办”职能作用，打造“行业主管、属地兜底，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工作机制，开展了一系列暖心服务。针对货车司机群体，制定纾困解难帮扶十条措施，建立“7+3+3”诉求收集办理反馈机制。针对网约车司机，出台“五大员三车厢”服务标准，帮助规范经营行为、提升行业服务质量。针对快递员群体，部署开展职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求学圆梦行动”，开设快递行业物流专业“专升本函授班”，切实帮助解决后顾之忧，回应发展之盼。针对新就业群体开展“免费体检”“免费疗休养”“免费体检健康关爱行动”“新就业群体温暖服务季”活动，先后组织500多人免费疗休养、5000多人免费体检，为5万多人免费赠送户外劳动者意外伤害保险。

（五）以作用发挥为目标导向，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针对新就业群体数量多、活动范围广、熟悉人情地情的优势，统战部门联合主管部门、工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积极探索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着力将他们培育成助推城市发展“新”动能、基层治理“新”力量。在外卖骑手群体中探索建立“积分制”，组建“骑手志愿队”“反诈宣传队”“消防志愿宣传队”，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达等方面发挥作用。发挥网络直播及时互动、传播力强的优势，会同组织部门、网信部门，组织网络主播群体打造“1+3+N”直播矩阵，即在各区（市）打造1个综合性党建工作站，设置“先锋直播间”“兴农直播间”和“惠企直播间”三大主题“红色直

播间”，在人流、直播流较大的商圈、景点、园区等地，搭建服务主播的N个主播加油站。组织开展“直播带货”20多场，销售额超2300万元，服务70多家企业的招聘用工，提供工作岗位1000多个。

三、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就业群体作为新生利益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统战工作视野的边缘地带。这既与其职业特殊性和成员复杂性有关，也与统战工作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有关。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仍然有待“破题”。

（一）数量规模庞大，身份界定模糊，统战工作精准性不足

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增长，新领域新业态新职业不断出现，新就业群体将长期处于快速增长状态。根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新就业群体总量高达8400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0.9%^[4]。有别于传统“企业+员工”固定就业模式，新就业群体以“平台+个人”灵活就业模式为主，大都属于“三无”人员——无固定劳动合同、无固定工作场所、无固定工作时间，呈现自由化、分散化、去雇主化等趋势。加之新就业群体成长期比较短，对他们的理论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普遍认可的概念界定和划分标准，对其数量规模、利益诉求、价值取向乃至行为偏好等基本状况仍然“不识庐山真面目”，还没有形成规律性认识，实际工作中存在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目标不准、对策不力等问题。

（二）重视程度不高，部门协同联动性不强，大统战工作格局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思想不重视，缺乏主动性。一些与新就业群体密切相关的部门或组织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一些偏差。例如，有的人认为新就业群体与党委中心工作关联性不强，做与不做无所谓，做多与做少无所谓，做好与做不好无所谓，忽视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有的人认为统战工作对象数量多少无所谓，

只要抓住几个“关键人物”就可以，工作存在“上头热、下头冷”不均衡现象；有的人认为新就业群体成员复杂，难以找到有效抓手，担心“出力不讨好，自找麻烦”，因而存在“少动员”甚至“不动员”的鸵鸟心态。另一方面，体制不健全，缺乏协同性。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和部门，在职责分工上必然存在交叉重叠现象，面对问题和困难有时难免相互推诿。虽然大多数地区已经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协调配合的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但联席会议制度运转更多局限于每年召开 1 次至 2 次碰头会，不同成员单位之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缺少常态化、制度化沟通协调机制，工作力量相对薄弱。

(三) 思想观念复杂多变，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凝聚思想政治共识的任务比较重

新就业群体大都比较年轻，属于典型的“后浪”，喜欢追求新事物新理念，创新意识和批判思维比较强，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自我、个性、不安于现状等后现代主义特征^[5]。

1. 利益需求比较理性务实，具有一定功利性色彩

调查结果显示：新就业群体“最希望得到满足的个人需求”是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占 63.2%；其次是相对较低的安全需求，占 18.9%；而层次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还只是少数人的追求，分别占 7.6%、6.2%、4.1%（见图 7）。甚至少部分人直接把获取财富、资源和权力作为个人最高需求，具有一定的功利性色彩和实用主义倾向^[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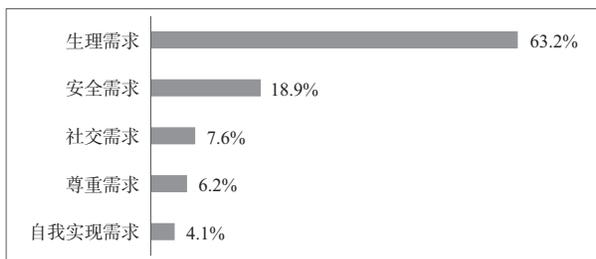


图 7 最希望得到满足的个人需求

这种个人利益需求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如果过度关注或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则可能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等消极价值观，进而侵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

2. 社会心态比较复杂，存在一定焦虑感和危机意识

从“政府和社会对新就业群体关心重视程度”来看，41.3% 的调查对象认为“一般”，30.8% 的人认为“不太重视”或者“非常不重视”，甚至认为存在一定程度职业歧视，只有 27.9% 的人认为“比较重视”或者“非常重视”（见图 8）。由于对工作稳定性、经济收入水平或者社会保障机制状况等外部因素不确定性的担忧，他们对未来公共产品供给和分配存在不安全感或焦虑心态，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相对被剥夺感”^[7]，继而引发对党、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或抵触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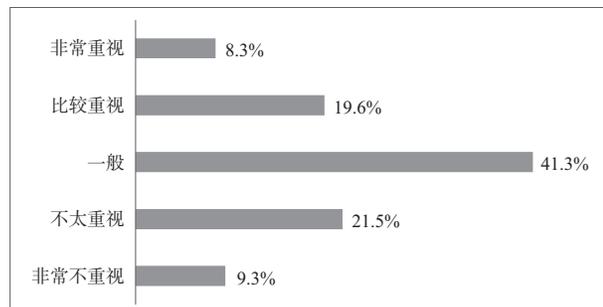


图 8 政府和社会对新就业群体关心重视程度

3. 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存在不确定性

新就业群体虽然普遍认同党的领导、社会制度、国家大政方针等，但政治把握能力不足，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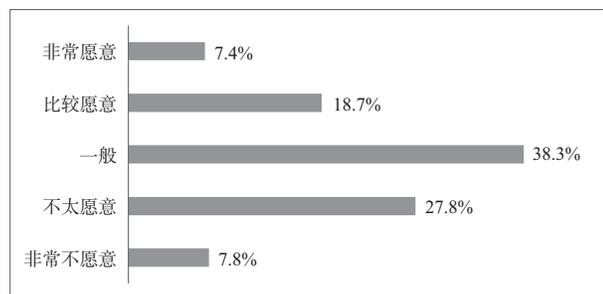


图 9 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

与政治活动的意愿相对较低。38.3%的人处于“一般”水平，35.6%的人“不太愿意”或者“不愿意”，存在不想参与、不会参与、没时间参与等现象（见图9）。这种政治疏离或冷漠心态可能导致他们对政治性事务倾向于扮演只围观、不表达、不参与的“吃瓜群众”角色。

4. 政治参与渠道比较少，存在非制度化参与倾向

调查显示：大部分新就业群体“表达意愿或维权最有效的方式”首选“通过法律渠道”，占30.8%；其次是“向党政主管部门反映”，占15.3%；还有“向工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反映”，占11.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治观念整体比较理性，愿意通过合法有序的制度化渠道解决。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一些制度不够完善、利益表达渠道相对狭窄以及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不足等现实政治生态下，少部分人开始选择“通过网络舆论施压”（占13.7%）、“私下找人、托关系”（占7.7%）、“公开上访、游行”（占5.2%）等非理性的或者非法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还有9.2%的人选择“没有办法，自己忍受”，主动放弃相关权利，体现了他们既无力又无奈的消极心理（见图10）。从现实层面分析，这些非制度化参与方式可能导致新就业群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面临两种错误倾向，要么“无所事事”——政治参与不足，要么“无所顾忌”——政治参与过度^[8]，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不可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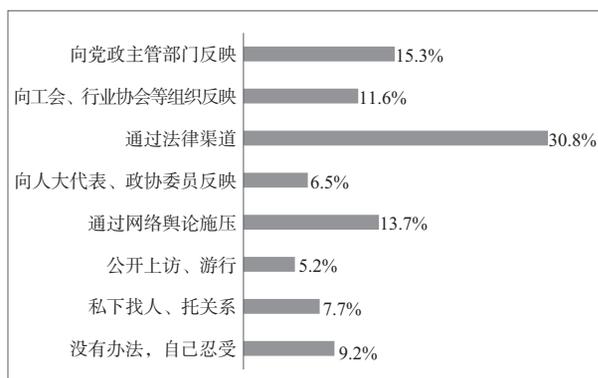


图10 表达意愿或维权最有效的方式

（四）有效工作平台载体不足，吸纳力和整合力相对较弱，组织起来难度比较大

新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社会职业的稳定性结构，突破了传统统战工作的覆盖范围，现有的实践创新基地、联谊组织、两新组织等统战平台载体的功能作用与新就业群体的发展需求不匹配，难以真正构建起“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立体化组织体系。

1. 组织成员数量比较少，呈现“内卷化”增长态势

相对于新就业群体的庞大数量，新联会、工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发展吸纳的成员数量极其有限，并且呈现“没有质量的增长”态势。主要表现在：组织类型单一，以兴趣爱好类和公益慈善类居多，而生活互助类和权益维护类相对不足；组织功能简单，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爱好或者参与志愿服务，很少具有政治参与功能；活动方式雷同，大都是相对容易组织的文艺娱乐、捐款捐物、帮老扶幼等活动，而涉及社情民意调查、权益保障、资政建言等方面的活动很少，影响力和辐射面有限。

2. 活动经费有限，发展不平衡

受地方财政状况、政策倾向以及重视程度等因素影响，以新联会为代表的统战组织普遍面临活动经费不足问题，只能被动地“等米下锅”或者“看人做饭”。不仅活动数量少、时间安排不固定，而且组织成员经常因活动时间与工作时间冲突而无法参加。多数组织以开会办班、举办讲座、公益服务等线下活动为主，很少采用与成员兴趣爱好、行为习惯、职业特点等相适应的线上活动方式，一些成员在参加过几次活动后就感觉没意思，失去参与热情。

3. 运转管理不规范，组织活力不强

大多数组织平台成长发育期比较短，还没形成相对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制度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比较弱。组织领导层的能力水平有待提升，对成员的号召力和动员力不足。

一些成员存在搭便车现象，把参与活动当成谋求个人利益或者出名的“捷径”，意图少付出甚至不付出而坐享集体行动的成果，分散了组织核心凝聚力。

（五）干部队伍力量比较薄弱，存在本领恐慌，统战工作效能不明显

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课题，缺少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先例，还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可以普遍推广的工作模式，而传统统战工作方式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就业群体成员结构多样化、思想观念复杂化、行为方式网络化等新趋势，面临失灵失能失效的风险。

1. 统战干部队伍不合理，人少事多的矛盾比较突出

缺人缺编问题是基层统战部门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大部分统战干部身兼数职，忙起来就无暇顾及本职工作，存在“专职不专，兼职不兼”问题。一些人认为统战工作做与不做都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工作主动性有所减弱。创新开展统战工作的本领不强，导致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很难向下延伸，覆盖面有限。

2. 统战资源有限，与统战需求不匹配

随着覆盖对象和范围扩大，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面临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一些基层统战部门受经费、场地、设施设备等条件限制，难以有效组织开展活动，缺少活动品牌，对新就业群体吸引力和动员力有限。另外，新就业群体对党的政策方针了解不够充分，对统战工作存在陌生感，与统战系统接触意愿不强，致使统战工作面临“进不了门，找不到人，对不上话，办不成事”的境地。

3. 工作思维固化，能力水平偏低

一些统战干部思维固化，不讲求工作艺术，习惯于用老眼光老办法来分析解决新问题，仍然局限于通过开会、办班、发文件等传统的工作方式去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统战工作对象，导致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效能比较低，推进速度

缓慢。

四、做好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的路径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需要按照“信任尊重、团结引导、组织起来、发挥作用”的思路，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基层治理水平，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提供力量。

（一）构建多元协同联动机制，壮大统战工作合力

为破解统一战线不统一问题，需要坚持大统战思维，在党委统一领导协调下，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打造多领域、多部门、多种力量强强联合的全域全要素统战模式。把新就业群体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一部分，探索纳入各级党委（党组）重要议事日程和党政领导班子工作考核内容的可行性^[9]。通过信息共享、协同研究、项目合作、集体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与主管部门、群团组织、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之间交流合作，实现“1+1>2”的效果。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尽可能形成规律性认知，提升统战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二）加强教育引导，凝聚思想政治共识

1. 以主题教育为主线，巩固共同思想基础

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把思想政治引领贯穿于活动之中，运用新就业群体喜闻乐见、简单易懂的形式，提高主题教育活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引导他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价值观、人生观，培育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2. 以教育培训为重点，提升参政议政能力

针对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特点和发展需求，注重共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把政治理论学习融入职业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之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长效化。注重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社情考察、实地调研、社会

服务等方式，增进对理论政策的体会与感悟。注重传统学习方法与现代网络化学习相结合，打造网络“微课堂”，为这一群体提供便捷学习的可能性。

3. 以服务帮助为关键，赢得情感认同

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思想引导与推动个人发展结合起来，积极回应新就业群体在工资收入、权益维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现实关切和利益诉求，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反映比较集中的困难和问题，为他们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实际行动把他们的“心”聚起来，使他们由“被统战”转变为“要统战”。

4. 以表彰激励为抓手，扩大社会影响力

通过增加表彰名额、扩大表彰范围，加大宣传力度等方式，对一些新就业群体中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进行公开表彰激励，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激发他们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扩大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达到宣传一个、影响一群，表彰一批、带动一片的示范效应。

（三）构建多元共生的组织矩阵体系，延伸工作手臂

1. 加强联谊组织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明确职能定位，把联谊组织打造成具有沟通联系、政策宣传、建言献策、服务社会、展现风采、创新创业、联谊交友等功能的综合性平台。坚持开门办会，发挥联谊组织成员的辐射作用，以人带人、以人招人，扩大联系面。提供服务支持，帮助联谊组织解决“注册难、经费少、待遇差”等现实问题。规范管理运转，提高联谊组织“自转”能力。

2. 依托行业性专业性社会组织开展工作

有目的地选择一批规模大、影响范围广、活动力强的社会组织，通过合作共建、项目对接等方式赋予其一定的统战功能，将统战工作主动“嫁接”上去。通过孵化培育，主动创建一批具有统战性质的社会组织。把类型、功能、活动方式等相同或相似的中小型社会组织整合成枢纽型

社会组织，扩大社会组织辐射面。

3. 发挥群团组织的服务和吸纳功能

加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对接联系，发挥群团组织点多、线长、面广等优势，共同组织开展活动。同时，以群团组织换届为契机，推荐更多新就业群体中的代表人士进入群团组织担任兼职领导或进入行业协会领导班子。

（四）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1. 配强统战工作力量

选配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文化素质高、善于团结人、热心统战工作的基层干部担任专职或兼职统战委员、统战联络员等，不断充实、优化基层统战干部队伍结构。同时，明确工作经费保障。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把新就业群体统战工作经费列入各级党委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保证必要的工作经费开支。

2. 加强业务能力培训

把基层统战干部教育培训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以干部队伍年轻化为导向，选送一批学历高、有潜力、创新意识强的年轻干部进行培养锻炼，提高统战干部队伍综合业务能力。

3.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对新就业群体进行分众分类研究，针对不同对象采取“靶向”精准统战方式，抓住重点人群，突破一点，带动一片。通过项目合作、对话协商、共同参与等方式，实现统战部门、主管部门、社会组织、平台企业等多方合作共赢。根据新就业群体工作在“云”上、行走路上的特点，打造“指尖上的统战”，善于通过网络收集民意、回应民声、解答民惑。

（五）积极探索“党建+统战”模式，依托基层党建推进统战工作

1. 压实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与统战工作“双重主体责任”

坚持区域化党建思维，依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推动楼宇、商圈、园区等成立联合党支部，实现基层党组织

由“外在植入”到“内生嵌入”的有机转变，努力在新就业群体中全面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新就业群体所在街道、社区、园区、平台企业等基层党组织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定期研究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作部署落地落实

2. 推动党建工作与统战工作“双向融入”

将统战元素融入已建成的党建、群团阵地。例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及各类驿站加挂统战标牌，同步宣传统战知识和政策，扩大统战工作的公众知晓度。将部分统战阵地提供给党建、群团部门，共同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服务，实现统战阵地与党建阵地目标上相互统一、结构上相互吻合、功能上相互支撑。

3. 服务个人发展与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双向赋能”

贴近新就业群体需求，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驿站、便利点等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工作和生活服务。充分结合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熟悉社情、与群众关系密切等特点，建立激励奖励机制，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发挥他们在突发情况预警、城市管理监督、服务困难群体、文

明安全宣传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他们从“管理变量”转变为“治理增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J]. 求是, 2023(13): 12.
- [2]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9.
- [3][5] 郭晓东. 全媒体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工作研究[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3): 154、146.
- [4] 李培林. 新就业群体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复杂且具有自身的特点——当前新就业群体的主要特征[N]. 北京日报, 2023-09-25(10).
- [6][8] 郭晓东.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动态与引领路径研究[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6): 26、29.
- [7] 袁博, 何勇平. 地位不一致性与相对被剥夺感[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38.
- [9] 吴雪燕, 卢勇. 我国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5): 45.

责任编辑: 吉强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效能提升的路径研究

——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王超 杜明润 陈芷怡

摘要:民营经济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本文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基于民营企业视角构建了“信心、能力、行动”的政策需求层次模型。通过对江苏省徐州市的调查,发现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主要存在资金纾解功能弱、助企惠企政策落实难以及政策环境保障不足的问题。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效能不足的关键原因在于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未能有效持续地参与政策体系的制定。建议从强化财政政策融资功能、推进政策落地落实、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民营经济政策效能。

关键词: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政策需求层次;效能提升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稳经济、促投资、降税费的政策措施,努力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3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营经济31条”)的出台,给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也标志着我国民营经济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江苏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需求,密集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若干政策措施》等系列政策。然而,一分在部署,九分靠落实。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效果。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效能如何?民营经济主体政策获得感如何?这些问题关乎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效果。鉴于此,本文通过调查江苏省徐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现状,探讨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为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优化与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政策参考。

收稿日期:2023-12-19

作者简介:王超,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學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基层统战、应急管理;杜明润,中国矿业大学孙越崎学院本科生;陈芷怡,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一、研究综述

关于民营经济政策，国内学者主要从政策效果、政策目标、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政策效果上，于小悦等采用量化分析法构建了省级民营经济扶持政策强度指数，发现民营经济扶持政策能够有效改善民营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且对于欠发达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扶持效果更显著^[1]。在政策目标上，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旨在给予民营经济更多生存空间，释放更多经济活力^[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政策不断完善，政策力度持续加大。政策目标体系主要围绕保障公平竞争环境、完善良好舆论环境、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等方面予以设计^[3]。在政策优化建议方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需要在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健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培育国际一流民营企业、构建富有活力的科创生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4]。民营经济发展离不开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要灵活运用政策设计让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不同的领域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5]。

总的来看，学界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为我们理解民营经济的定位、作用、价值及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参考。然而，目前学界关于民营经济发展政策及其效能的探讨仍显不足。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主要以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为主，一定程度忽视了对政策对象——民营企业的关注；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多以规范研究为主，缺乏基于实地调查分析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文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聚焦民营企业的多元政策需求，通过深入调查访谈来回应以上不足。

二、研究设计与理论模型构建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效能提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遵循“理论阐释、现状剖析、问题诊断、路径设计”的研究思路。其中，理论阐释在于构

建我国民营企业的政策需求层次模型，厘清民营企业政策需求层次的内在逻辑；现状剖析在于厘清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问题诊断是基于理论分析和现状调研，分析江苏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路径设计则是着眼政策效能的提升，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优化建议。

本文主要采用网络调研和深度访谈法，调研时间为 2023 年 7 月到 10 月，有效问卷样本数为 445 份。样本设计涉及民营企业的地域分布、员工规模、资产规模、营业收入、经营年数、行业分布等基本特征，并聚焦政策知晓度、政策获得感等。

（二）理论模型构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以人的行为激励或动因为研究重心，阐述了人类需求的五级层次及其关系。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马斯洛指出，动机是行为的先导，人们需要动机实现某些需求，且这些需求之间存在层次之分，有些需求优先于其他需求。本文将该理论引入民营经济发展政策分析，认为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多重政策需求之间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层次与逻辑，这就要求政策体系的制定与执行具有层次性、渐进性与系统性。

民营经济发展与企业家、企业组织和市场三大主体密切相关。企业家是民营企业的核心，其经营信心与发展预期直接影响整个企业的经营动力；企业组织是民营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构成细胞，是各种生产要素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载体；市场是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是调整民营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指向标，企业所有的经营行为都离不开市场机制的调控。基于以上理解，民营企业存在三种基本的政策需求。一是基于企业家信心的生存需求，这是企业经营最基本的需求。民营企业健康成长，民营企业才能健康发展。特别是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信

心比黄金重要”，提振企业信心、增强企业家的安全感成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首要目标。二是基于组织能力的发展需求。民营企业发展依赖于劳动力、土地、资本、数据等要素的有效组合，提升要素的组合效能必须依靠企业内部各类组织的有序运转。三是基于市场环境的发展壮大需求。亲清政商关系与优质高效市场环境是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外部基础与先决条件。

基于以上三个逻辑，本文从“个体、组织、市场”不同层面的政策需求分析出发，构建由信心、能力、行动三个维度构成的民营经济发展政策需求层次模型。从模型可以看出，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效能来自是否增强了民营主体信心、是否提升了企业生产能力以及是否促进了企业扩产行为。实质上，无论哪个层次的经济运行，都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参与。因此，充分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效能的关键，在于有效吸纳民营企业参与政策制定，并围绕民营企业的多重需求来优化政策体系。

三、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现状分析——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一）民营企业发展的特征

对于民营企业发展特征的系统把握，是精准制定与实施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基础与前提。调查显示，当前江苏民营企业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企业规模较小。83.59%的民营企业员工数量在100人以内，超过300人的仅占5.39%。57.08%的民营企业2022年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23.37%的民营企业在10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超过1亿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为9.66%，超过10亿元以上的企业仅为1.12%。

二是用工本地化。民营企业用工存在明显的本地化倾向，有62.92%的民营企业用工面向本地人。

三是经营年数较短。民营企业经营年数在10年以内的比例达到67.64%，经营超过20年的民营企业仅占11.46%；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的分别

占24.27%和36.63%，这反映出本地民营企业普遍较为年轻。

四是行业特色明显。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商贸和批发业等传统行业占比较高，尤其是制造业占比为39.10%。

五是整体发展态势平稳。37.80%的民营企业无负债，33.48%的民营企业负债率为1.00%至30.00%，负债70.00%以上的企业占比为4.49%。与2022年下半年相比，2023年上半年43.15%的民营企业经营收入基本持平，21.31%的企业经营收入增长，35.30%的企业经营收入下降。与2022年相比，民营企业信心有所提振，对未来发展壮大信心的占比为23.37%，比较有信心的占比为33.03%，没有信心的占比仅为8.54%。

（二）民营企业对发展政策的认知分析

当前民营企业对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认知有以下特征。

一是民营经济政策知晓度不高。针对“民营经济31条”熟悉度调查，有26.96%的企业表示“不熟悉”或“完全不了解”，“非常熟悉”的仅占11.01%，反映出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

二是“发展环境”与“政策支持力度”是民营企业最关注的政策内容。针对“民营经济31条”的调查，民营企业关注度最高的政策内容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占比为68.54%；其次为“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占比为67.64%；关注度较低的为“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占比为33.26%（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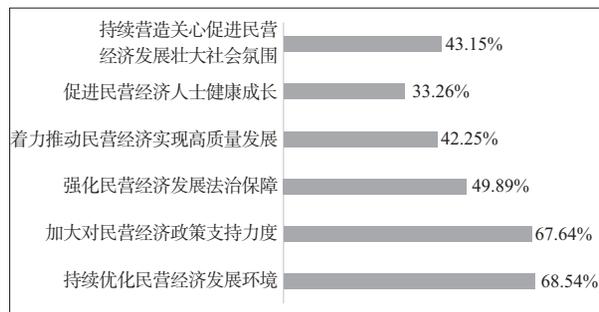


图1 对“民营经济31条”不同内容的关注程度

三是“减税免税”与“服务指导”是民营企业享受到的主要惠企政策。在对 2023 年民营企业主要惠企政策调查中，享受最多的政策为“减税免税”，占比为 57.53%，其次为“服务指导”，占比为 43.37%，享受较少的为“财政资金支持”与“房租减免”，占比分别为 24.94% 和 23.15%（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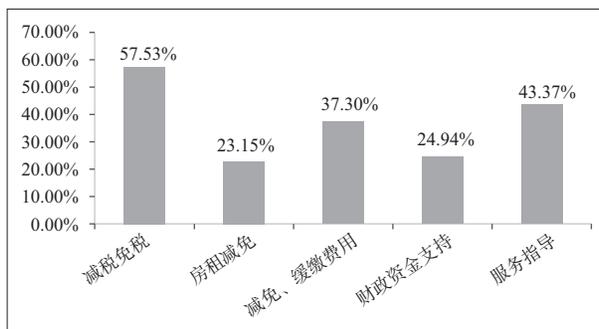


图 2 民营企业主要享受的惠企政策

四是助企惠企政策实效有待加强。在对“政府惠企政策效果”的调查中，有 55.05% 的企业表示有效果，有 23.15% 的企业表示“没有改变”，表示没有效果的占 20.23%。另外，还有 1.57% 的民营企业表示政策出台反而增加了企业负担。

五是政策实施效果影响因素复杂。在对“影响助企惠企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的调查中，最高的为“政策细化不够，难以落实”，占比为 42.92%。（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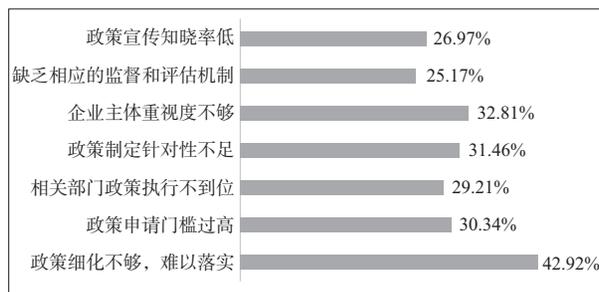


图 3 影响助企惠企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

六是营商环境满意度不高。在对“当前江苏省营商环境满意度”调查时，发现营商环境总体

评价一般，为 3.52 分。具体评价指标中，“政府关怀”评价最高，为 3.59 分，“信贷融资环境”评价最低，为 3.46 分（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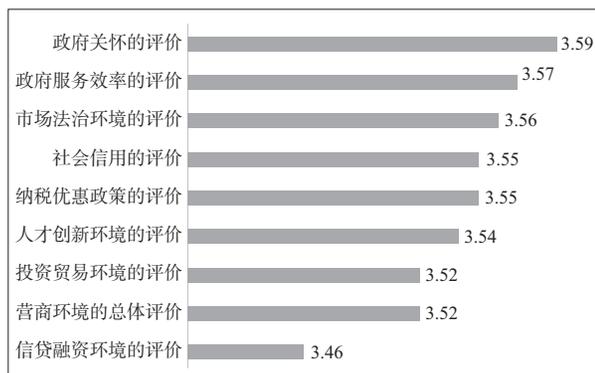


图 4 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情况

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效能不足的表现

（一）资金运转面临挑战，削弱企业发展信心

目前，不少民营企业仍面临资金紧张、现金流短缺的困境，导致企业生产资源投入不足。调查显示，有 31.00% 的企业明确表示“现金流紧张，资金压力大”，具体如下。

一是市场需求疲软。调查显示，民营企业面临的来自市场供求矛盾引发的资金链断裂，主要表现为“行业风险”和“供求风险”，占比分别为 56.00% 和 42.50%。有 43.10% 的民营企业认为“市场需求受到抑制，订单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二是企业项目款被拖欠。目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现象时有发生。调查显示，企业呼声最高的是“完善拖欠账款预防和清理机制”，有 55.80% 的企业表示该机制“重要”或“非常重要”，有企业希望“尽快支付拖欠民营企业的工程款，否则会将企业拖垮”。

三是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疫情结束后，企业投资意愿高涨，融资需求扩大，但较高的融资门槛和成本阻碍了民营企业投资意愿。调查显示，有 26.90% 的企业表示“融资需求增加，融资难度大”，给企业带来风险冲击。在对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时，“信贷融资环境”指标的得分最低。

(二) 助企惠企政策落实难, 制约企业发展后劲

近期以来, 我国密集出台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措施, 但调查显示, 仍有 43.30% 的企业表示惠企政策没有改变企业状况, 或者效果不佳, 甚至有 1.60% 的企业表示相关政策反而增加了企业负担, 产生了负面影响。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民营经济政策发布部门多、文件来源广, 加之政府部门对政策的宣传、解读与引导工作不到位, 导致部分民营企业对政策了解碎片化, 难以用好政策。调查显示, 当前对省内民营经济政策非常熟悉的民营企业仅占 11.00%, “不熟悉”和“完全不了解”的占 26.90%。

二是政策门槛设置过高。目前, 地方出台的部分民营经济支持政策缺乏具体的操作流程, 申报附加条件多, 流程设计繁琐, 政策表述不够通俗形象, 一定程度影响了政策惠及面。调查显示, 有 30.30% 的民营企业表示政策申请的门槛过高。

三是政策链条衔接不顺畅。助推企业“轻装快跑”的关键在于政策的时效性, 但是各类惠企政策从“纸面”到“地面”需要经过层层分解、逐级细化、分步实施, 不仅涉及政策执行部门之间的衔接协调问题, 而且不同政策之间还存在摩擦冲突, 影响政策及时落地。调查显示, 33.30% 的企业认为, 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

四是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定期对政策落实的效果进行科学评估, 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政策, 对确保政策落实至关重要。25.20% 的企业认为惠企政策缺乏相应的监督和评估机制。面对新出台的政策, 地方政府短期内缺乏相应的配套细则、监督考核与问责机制。政策评估以政府内部评估与专家评估为主, 缺乏吸纳民营企业参与的有效机制。民营企业反馈渠道局限于简单座谈、走访, 无法有效获取整个企业家群体的诉求和意见。

(三) 法治保障不充分, 影响企业生产秩序

行政执法是营造公平诚信竞争环境和塑造亲清政商关系的重要路径。然而, 一些政府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频次高、效率低、重形式,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一是一定程度存在执法“扰企”现象, 行政执法方式有待优化, 执法满意度有待提升。民营企业对于一些频繁、重复的执法检查带来的“扰企”现象感到不满, 表示某些检查频繁, 会影响企业生产, 希望“减少一些检查的频次”“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在执法方式上, 部分企业希望“加强柔性执法”。

二是有些行政检查表面化。部分企业反映, 有些政府人员进企业调查不深入, 倾听企业心声不够, 蜻蜓点水, 走过场。一些企业希望相关政府部门能够更深入了解企业真实情况,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三是行政审批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 行政审批部门在为民营企业办事过程中, 有时还存在拖沓、滞缓等现象, 导致行政审批效率不高, 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率。有企业举例指出, “由于征地建设的流程手续太过缓慢, 导致企业错过发展的最好时期”。同时, 也有企业表示, 对于企业上报的问题, 一些政府部门信息反馈慢。

五、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效能的路径

(一) 强化财政政策融资功能, 保障企业资金活力

一是提升财政政策准度。政府决策部门综合施策, 着力减轻企业税收、社保缴纳、用水用电用气缴纳等生产经营成本, 降低相关政策适用门槛, 让更多政策惠及中小微企业, 切实增强企业政策获得感。

二是健全融资支持力度。运用贷款风险补偿、贷款贴息、担保业务降费奖补等多种财政支持方式, 切实降低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 探索建立面向小微企业的贷款服务中心, 解决民营企业贷款难、续贷难、成本高等问题。

三是完善融资政策协同度。强化融资担保相关政策内部衔接，形成跨部门支持行动合力。加大政策体系协调性，增强政策制定标准化和科学化水平，优化政策配套支撑，从而提高政策执行效果。鼓励地方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继续下沉服务，提高对小微企业的普惠力度。

四是建立拖欠企业账款追溯机制。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建立政府失信责任追溯和承担机制以及诚信履约机制，对拖欠中小民营企业款项的行为要依法问责，保障民营企业资金回笼。

(二) 扎实推进政策落地落实，增强企业政策获得感

民营企业发展政策好不好，既要考虑到政策的社会效果，也要考虑到民营企业的“认同感”。

一是加大宣传解释力度，提升政策知晓度。综合利用新闻发布会、短视频等传统与新型媒介平台，拓宽信息发布和解读渠道，扩大宣传覆盖面。建设惠企政策信息服务“一站式”平台，做好关键条文、新旧政策差异、操作方法等解读。运用政策明白卡、惠企政策计算器等简明有效的工具，使民营企业 and 个体工商户便捷、全面地知晓政策、获取政策、用好政策。同时，建立政策精准推送机制与“免申即享”平台，确保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二是提升政策科学性，精准回应企业关切。建立民营企业涉企政策制定机制，从政策源头上提高涉企政策的针对性和可及性，充分反映企业的诉求。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细化的、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以回应企业关切。

三是注重政策效果评估，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开展政策执行的专项检查，建立涉企政策评估反馈机制。对可能增加企业成本、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政策要及时优化调整。及时纠正政策执行层面出现的偏差，避免政策执行的简单化。

四是缩短执行链条，提升政策时效性。建立

健全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协调机制，加强跨部门间的沟通协作，明晰执行部门和操作流程，提高政策可操作性。加强政策体系的内部衔接与互补，避免政策条目重复或冲突。探索行政办理流程数字化、网络化，构建集约高效、自主可控的“数智”支撑体系，简化申请环节与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提高政策兑现效率。

(三) 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一是畅通政企沟通渠道，规范政商交往行为。推动各级党政干部坦荡真诚同企业家交往，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同企业家建立真诚互信、清白纯洁、良性互动的工作关系。鼓励企业家积极主动同党政干部沟通交流，引导更多民营企业成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模范。

二是深化法治护航。成立地区法治护航中心，专门为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提供菜单式、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定制服务，全力解决民营企业职工法律意识淡薄、职务犯罪频发、产权保护不力等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对侵害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制度。

三是畅通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联系沟通机制。建立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沟通协商平台，定期组织召开民营经济发展情况通报会和民营企业座谈会，通报当地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听取企业家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畅通与民营企业家的交流沟通渠道。

四是构建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机制。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完善涉企收费行为的监管办法与治理长效机制，以制度化形式破除根源性、深层次的违规收费问题。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精准、稳定、力度高的民营经济政策支撑。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国内外市场竞争格局深刻演化，民营企业能否顺势而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既依赖于企业的自身

转型,也需要加快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创造出更具竞争力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 于小悦,张璠,王竹泉,等.民营经济扶持政策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自省级政策文本量化的经验证据[J].财务研究,2023(3):50-66.

[2] 杨新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J].学习与探索,2019(11):89-96.

[3] 杨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政策演进及启示[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2):112-115.

[4] 罗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对策建议[J].人民论坛,2023(15):76-79.

[5] 杨瑞龙.构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3(6):4-12.

责任编辑:蒋建忠

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逻辑理路与作用机制

陈 亮

摘要:基于“政党引领式关联”的分析框架,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涵盖了价值引领、战略驱动、平台搭建、多元融合等多个相互交织的逻辑理路。从价值引领来看,主要通过党建嵌入治理、企业文化形塑、主题教育开展、先进典型示范等作用机制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从战略驱动来看,主要通过国家战略制定、政策措施激励、示范项目助推、舆论氛围营造等作用机制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从平台搭建来看,主要通过信息发布与共享、资源整合与对接、经验分享与学习、政企对话与交流、项目对接与合作等作用机制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从多元融合来看,主要通过企业观念融合、发展规划融合、经营管理融合等作用机制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

关键词: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社会责任;政治关联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1]。作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企业家不仅承担着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艰巨使命,还需要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关注社会重大关切以及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202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民营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2],为新时代引导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建引领是推动民营经济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健康发展的关键抓手,在引导和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学界对于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研究较为不足,尤其是缺少从党建引领维度的系统性思考和针对性探讨。鉴于此,本文运用政治

收稿日期:2023-12-19

作者简介:陈亮,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新时代统一战线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研究”(ZYSY-HTGL-2023-17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联理论,建立一个“政党引领式关联”的分析框架,探讨党建引领在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运行规律,揭示其在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中的逻辑理路及其作用机制。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 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民营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引导和激励民营企业家履行更多社会责任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因此,如何通过党建引领,激发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其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追求,成为时代重任的担当者?党建引领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什么样的逻辑理路,其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新时代引导和激励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不得不思考的重大课题。

(二) 文献回顾

围绕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主题,学界分别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角度进行了针对性的回答,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一是围绕“内涵、内容、特征”,诠释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内涵上看,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是指民营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3]。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并不只是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还是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家身上人格化的具体体现^[4]。从内容上看,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呈现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的多面向金字塔形状^[5]。民营企业家不仅需要履行慈善公益责任,更重要的

是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6],它不仅包括对股东、员工、债权人等内部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还包括对社会公众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7]。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涵盖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对企业员工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保护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态平衡的责任、维护正常经济秩序的责任、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等等^[8]。从特征上看,虽然民营企业家对于应该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具有高度的共识,但是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表现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分布。第一,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点存在明显差异性。有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一般将法律责任、经济责任置于伦理责任、慈善责任之前^[9];有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与提高员工福利和保证产品安全性相关的各项社会责任行动上^[10]。第二,在不同管理规模、文化情境、行业因素下,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存在明显差异。一般而言,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家地位认同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越大^[11];企业所在地区的儒家文化强度越大,民营企业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越好^[12];行业因素也是造成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有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13]。第三,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形式存在明显差异性。研究表明,由于履行社会责任的对象、企业的具体条件以及企业家自身特征差异,使得民营企业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呈现多样化的形式^[14]。

二是聚焦“宏观背景、中观过程、微观机制”,探讨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履行社会责任这一问题。从宏观背景来看,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既是我国的法定要求和传统规范,也是构建公民社会的客观需要^[15];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包含着平等的价值理念,从平等出发上升到企业伦理,这是其最根本的理论基础^[16]。从中观过程来看,我国民营经济是在政府引导、规制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政府在引导民营经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发展的同时,积极引导

民营企业家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17]。从微观机制来看,履行社会责任较好的民营企业家能够获得较好的政治激励,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家更容易被吸纳进地方政治系统,慈善捐赠投入能够提升民营企业家担任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概率^[18];民营企业家通过商会任职将商会会规及宗旨融入企业经营活动和维护企业声誉两个渠道,从而实现履行相应社会责任的目的^[19];地位认同有助于提升企业声誉行为和亲社会行为,推动民营企业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0]。“三会”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建立党组织对企业的慈善捐赠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并发挥积极作用^[21];依托非公党建这一平台,通过提升企业家自我认知和开展统战教育两个渠道影响民营企业家参与光彩事业^[22],此外,与官方机构互动和接受更多官方政治引导也是民营企业中党建驱动慈善的两种机制^[23];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制度环境以及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效应更加凸显^[24];党建引领、政治吸纳、地位感知以及企业家精神是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四重动力机制^[25]。

三是聚焦“问题表现、背后成因、破解路径”,从“怎么办”的维度探讨更好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这一问题。从问题表现来看,部分民营企业家在对次要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时存在认知度偏低、被动投入的现象;企业缺乏独立的社会责任部门和专职人员,个别公益慈善基金会运营成效较低;民营企业的捐赠渠道分散,接收捐赠资金的部门或组织缺乏统筹与互通机制^[26]。产生上述问题,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与民营企业家群体不成熟有关,如出现时间较短、缺乏归属感、成分较为复杂等^[27]。从破解路径来看,应该从加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入手^[28],制订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疏通民意渠道、加强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培训、促进社会意识或社会伦理投资运动^[29];结合年轻一代企业家的特点加强社会责任教育和引导,通过提倡战略性慈善推动社

会责任与企业发展有机融合,围绕精准吸纳充分发挥政治安排的“指挥棒”作用,通过加强外部监督构建多元社会责任体系^[30];从建立健全张謇式企业家培育机制、创新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信息互通机制、完善民营企业家政治安排机制等方面推动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31]。

既有研究对于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依据、内容、方向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为理解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积累和经验素材。然而,纵观既有研究,目前还缺少基于党建引领的维度观察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针对性思考。鉴于此,本文将党建引领这一变量纳入,系统阐释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中的逻辑理路及其作用机制,为理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新的视角。

二、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一) 理论基础:政治关联

政治关联是理解政企关系的一个代表性理论视角,对于企业的发展和价值创造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Fisman R 认为,对于一个具有良好政治关联基础的企业或公司来说,其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源自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在世界上许多最大和最重要的经济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32]。Faccio M 等以 1997 年至 2002 年的 35 个国家 450 家政治关联公司为分析样本,研究发现:相比于类似的非政治关联公司,政治关联公司更有可能获得紧急援助;此外,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向公司所在国提供财政援助时,那些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有可能获得紧急援助^[33]。Blau BM 等指出,政府更加信任那些具备政治关联的企业,这是因为政府更容易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那里了解企业经营的实际信息,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申请政府救助计划能够得到更加迅速的批复^[34]。政治关联对于中国语境下的政企关系运作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适用性。林润辉等指出,政治关联具有信息管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事实上，民营企业为了维护政治关联，也倾向于提高相关信息披露质量，以取得政府的信任^[35]。

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广义政府的重要部分，还在企业与政府之间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领导角色。准确回应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这一主题，提升政治关联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需要立足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这一背景，把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体系这一主体纳入分析范畴。为了准确反映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独特作用，本文尝试对政治关联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建立一个“政党引领式关联”的分析框架，以期为理解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现象提供具有适用性、解释力的理论工具。

（二）分析框架：“政党引领式关联”的分析框架

“政党引领式关联”这一分析框架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建构政治关联网络的领导作用、核心作用。当把“政党引领式关联”用于解释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时，可以进一步地将其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通过价值引领、战略驱动、平台搭建、多元融合的有机统一，与民营企业家之间建立广覆盖、紧密式、制度化的政治关联网络，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优势、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优势的一种政党统合式助推现象。基于“政党引领式关联”的分析框架，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工程，涵盖了价值引领、战略驱动、平台搭建、多元融合等多个相互交织的逻辑理路。这些逻辑理路彼此支撑、有机统一，并通过相应的作用机制发挥助推效应，共同构成了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完整图景。

三、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引领逻辑及其作用机制

在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

价值引领起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价值引领，是指将党的治政主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于民营企业文化以及民营企业家的思想观念之中，实现价值体系的深度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基本途径。它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形塑为基础，在整个社会中塑造一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导、激励和规范民营企业家的各种社会责任行为。在具体实践中，价值引领主要通过党建嵌入治理、企业文化形塑、主题教育开展、先进典型示范等机制发挥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

一是党建嵌入治理机制。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让一些符合条件的党员通过法定程序加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通过党建活动嵌入民营企业治理结构，进而将价值引领这一内核融入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队伍建设、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通过党建嵌入治理机制，不仅可以引导民营企业家履行法定责任，还可以充分激发他们积极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二是企业文化形塑机制。企业文化是企业行为的基因，它能够在党建引领下对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起到濡化和引导作用，这就是企业文化形塑机制。通过党建引领，将党的政治主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营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塑造积极向上、团结协作、奉献社会的精神品格，为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三是主题教育开展机制。开展主题教育是引导和激发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机制。通过党建引领，制定主题教育工作方案、开展主题教育专题学习、组织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等方式，能够引导民营企业家在价值理念、思想意识、法规遵从、目标设定等方面更全面、系统地认识和践行社会责任，推动民营企业家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行社会责任的实际行动。四是先进典型示范机制。先进典型示范是一种“以点带面”的党建引领民营企业

家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机制。在党建引领下，选择一些履行社会责任的典型范例，通过荣誉奖励、媒体宣传、参观学习等发挥榜样效应、示范效应，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向先进典型学习。

通过这些机制的有机结合和综合作用，价值引领不仅有助于激发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也有助于促进企业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同频共振，使其更好地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价值引领强化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治导向和全局意识，对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四、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战略驱动逻辑及其作用机制

战略驱动是以国家战略为引领，推动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朝着国家战略规划的方向、领域、目标发力的顶层设计。战略驱动一般通过明确的战略布局、任务安排、政策设计，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民营企业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自觉地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之中，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民生福祉的一体化发展^[36]。战略驱动旨在通过指导思想、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工作机制等内容的顶层设计和高位推动，为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有力的政策保障。

从具体实践来看，战略驱动主要通过国家战略制定、政策措施激励、示范项目助推、舆论氛围营造等机制推动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一是国家战略制定机制。党中央通过发布全面性、前瞻性的国家战略规划方案，明确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重点任务。在这些战略规划中，党中央指出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必要性，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将民营企业的发展纳入国家战略的具体落实之中。在党建引领下，各地民营企业结合自身特点、优势，在科技创新、产业升

级、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光彩事业等方面履行社会责任，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贡献自己力量。例如，阿里巴巴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这一重大战略工程。二是政策措施激励机制。为了更好地激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党中央围绕相关国家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涵盖税收优惠、金融支持、荣誉奖励、责任评价等配套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通过实质性的激励和支持，营造一个有利于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政策环境。三是示范项目助推机制。通过在特定领域、行业、地区、企业中设立履行社会责任示范项目，有针对性地发挥示范项目的助推效应，激发和引导其他民营企业参与到社会责任履行的行列中来，从而在全社会形成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示范效应和助推效应。四是舆论氛围营造机制。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宣传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功案例、先进典型，提升全社会对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认知度和支持度，为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五、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平台搭建逻辑及其作用机制

在党建引领下，平台搭建是推动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环节。所谓平台搭建，是指通过建立信息传递、资源整合、服务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实现民营企业之间、企业与党政部门、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赢的一种机制。

从平台类型来看，主要包括四种：一是政府主导的平台，如民政部设立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平台”，这类平台通常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二是行业协会主导的平台，如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设立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这类平台侧重于行业内的社会责任实践和交流；三是企业自发的平台，如腾讯公司设立的“腾讯公益平台”，这类平台往往由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发起，旨在推动特定领域的社会责任实

践；四是数字化平台，如各种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这类平台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了社会责任实践的个性化、便捷化、大众化。

从具体实践来看，平台搭建主要通过信息发布与共享、资源整合与对接、经验分享与学习、政企对话与交流、项目对接与合作等机制发挥作用。一是信息发布与共享机制。通过定期收集和发布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最新研究成果、政策动态、最佳实践等信息，使民营企业家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社会责任信息、政策变化、实施标准等，以便及时调整和优化自身的社会责任履行实践。二是资源整合与对接机制。平台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供需对接的机会。通过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精准衔接，平台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家更高效地找到合作伙伴，分享资源，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高效化、可持续化。三是经验分享与学习机制。依托这些平台，通过提供专业培训、分享典型案例、聘请专家顾问，以及组织民营企业家论坛、沙龙、考察、学习等活动构建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履行社会责任支持体系，助力民营企业家全面提升社会责任履行能力。四是政企对话与交流机制。通过平台搭建，建立常态化的政企对话与交流机制。党政部门与广大民营企业家建立亲清政商关系，不仅能够促使党政部门更好地理解民营企业的需求，也能够促使民营企业家更好地理解政策的本意、导向。五是项目对接与合作机制。根据民营企业的特点、社会责任项目的需求，党政部门实现社会责任项目的精准匹配与专业定制。在项目对接过程中，有关部门可以协助民营企业家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等相关资源以支持项目的顺利实施。总体而言，通过搭建平台及持续迭代和优化，有效发挥了信息传递、资源整合、服务提供和促进交流的功能，有力地推动了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进程，同时也对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长久的影响。

六、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多元融合逻辑及其作用机制

履行社会责任是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的战略规划和日常经营，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和社会认可度，更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关键之举。因此，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紧密融合到民营企业的运营和发展中，积极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呈现出政治方向、企业发展和社会责任的多元融合逻辑。这一逻辑的核心在于引导民营企业家坚定政治立场，追求高质量发展，在实际行动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实践角度来看，多元融合逻辑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来推动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一是企业观念融合机制。党建引领对转变民营企业固有的“以资本为中心”观念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通过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广大民营企业能够逐步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政治方向、社会价值与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方向、效率、公平”三者的有机统一。这一转变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对政治理念、企业理念、社会理念的多元融合，不仅有利于民营企业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也为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坚实的观念基础。二是发展规划融合机制。在党建引领下，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责任要求深度融合到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中，确保民营企业的发展目标与国家宏观战略和社会责任履行紧密相连，实现国家使命、社会使命和企业使命的有机统一，从而在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广阔的视野下审视和规划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三是经营管理融合机制。通过党建引领，将政治方向和社会责任全面纳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之中，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责任要求在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层面和环节得到具体落实。这一机

制有助于民营企业家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全面地考虑政治方向和社会责任,使之成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总之,通过政治方向、企业发展、社会责任的多元融合逻辑以及企业观念融合、发展规划融合、经营管理融合等作用机制的助推效应,可以有效地推动民营企业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恪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有助于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构筑政治方向明确、企业发展稳健、社会责任充分履行的“三位一体”和谐共生格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81.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EB/OL].(2023-07-19).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7/content_6893056.htm.
- [3][8] 石晓梅.论私营企业的社会责任[J].行政论坛,2006(1):73、73-74.
- [4][14] 叶闽慎.民营企业家社会责任观浅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5(9):97、99.
- [5] Carroll A B.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J].Business Horizons,1991(4):39-48.
- [6] 陈婉婷,罗牧原.信仰·差序·责任:传统宗教信仰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基于福建民营企业家的调查[J].民俗研究,2015(1):140-148.
- [7][12] 涂未宇.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实证检验[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16、115.
- [9][26][31] 刘素素.新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研究——以苏州地区为例[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1):68、66、62.
- [10][13] 陆雄文,梁晓雅.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观[J].经济管理,2009(8):64、64.
- [11][20] 毛德凤,彭飞,陈意.地位认同能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吗?——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证据[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57、168.
- [15] 毕素华.论我国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J].广东社会科学,2011(2):37-41.
- [16] 刘国新.共同富裕视域下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基础与理论依据[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82-90.
- [17] 全哲洙.紧紧围绕“两个健康”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听党话跟党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J].求是,2015(19):14-16.
- [18] 黄伟,陈钊.民营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政治激励——兼论第三次分配的机制设计[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4):40-52.
- [19] 修宗峰,王敏.民营企业家商会任职与连续慈善捐赠行为[EB/OL].(2023-10-25).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sf24_f5fySY06PIaLjhaFb9DOHgtP5_NPQIvUe5JNz_AZ5siYTa4y9gRPf4ZGTiG7dBsYgKV-tXpYpFxFxGetbVfTqaMn7KhcrOvkqdPrSynaQo1z1Emp0Kv_pqMFB9jnobJZscBhR33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 [21] 梁建,陈爽英,盖庆恩.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治理结构与慈善捐赠[J].管理世界,2010(7):109-118.
- [22] 原东良,周建.非公党建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参与光彩事业吗——基于第十一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微观数据[J].当代财经,2020(5):123-134.
- [23] 黄杰,郑静.党建驱动慈善:民营企业中党组织的公益效应与机制研究[J].公共管理评论,2022(3):123-147.
- [24] 肖红军,阳镇,张哲.私营企业党组织嵌入、企业家地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J].管理学报,2022(4):495-505.
- [25][30] 黄杰,杨景朝.新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动因与优化——基于江苏调查数据的分析[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3):49、46.
- [27] 陶文昭.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义研究, 2010(3): 51-54.
- [28] 陈秋红, 马倩, 王书柏. 党建对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及其效应的影响——以农业产业为例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4): 178-190.
- [29] 胡刚. 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企业家社会责任——对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思考 [J]. 中国经济问题, 2006(6): 20-26.
- [32] Fisman R.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4): 1095-1102.
- [33] Faccio M, Masulis R W, McConnell J J.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6(6): 2597-2635.
- [34] Blau BM, Brough TJ, Thomas DW. Corporate Lobbying,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Bailout of Bank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3(8): 3007-3017.
- [35] 林润辉, 谢宗晓, 李娅, 等. 政治关联、政府补助与环境信息披露——资源依赖理论视角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2): 30-41.
- [36] 陈亮, 李元. 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四种类型及其运行机理 [J]. 探索, 2022(3): 120-131.

责任编辑: 蒋建忠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浙江 11 个设区市的面板数据

余海凤

摘要:推动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是浙江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全球创新高地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 2011 年—2021 年浙江省 11 个设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区位熵描述了浙江省各设区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格局,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浙江省各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影响。研究发现:浙江省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显著推动当地创新能力提升;相邻区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提升同样能促进本区域的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关联度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区域创新能力越强,但邻近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投入水平的提高会抑制本地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集聚;区域创新能力;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溢出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高知识密集性、高创新水平、高技术含量等特点,其集聚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效提升有重大促进作用。2022 年,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到 7331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33.47%,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1 个百分点,已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以浙江省各设区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产业集聚与各设区市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剖析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聚和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在设区市层面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的良性互动提供实践参考。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针对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探讨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杨浩昌等指出,通过减少创新投入,增加创新有效产出,制造业的集聚能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或技术效率提升,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率提升,并认为技术效率的改善

收稿日期:2023-09-28

作者简介:余海凤,杭州市富阳区委党校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是制造业集聚促进创新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途径^[1]。董晓芳等以生命周期视角讨论了本地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如何影响不同区域的创新水平^[2]。杨坤等认为,工业产业集聚水平增加能显著推动区域创新绩效,就高新技术产业而言,技术研发的作用尤为显著^[3]。Dijk M等指出,产业集聚对知识和创新要素的传播有极大利好,可以通过产业生产关联和企业关联对区域的创新表现产生影响^[4]。二是产业集聚过程中企业活动、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Goldman B等认为,邻近区域引起的知识溢出对于区域创新水平提高至关重要。因此,技术相对落后的企业在进行企业选址时更倾向选择创新活动密集的地区^[5]。张可等认为,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存在交互作用,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6]。三是围绕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的实证研究,现有研究结论不一。孙超等采用面板Tobit模型,发现长三角地区能通过产业协同集聚实现创新效率的提升,而京津冀地区不能^[7]。戴玲等基于2010年—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协同集聚、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三者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不同作用,认为三者均能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且作用由大到小的排序为协同集聚、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8]。四是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王晓彦等考察了产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产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且其正向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9]。马亮等基于空间溢出视角,认为专业化集聚对邻近地区存在显著负向溢出效应,而多样化集聚对邻近地区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10]。徐丹等认为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11]。

现有研究从理论、实证和方法等不同角度对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展开讨论,取得的研究成果

较为丰硕。但上述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现有针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大都关注总体集聚水平而较少围绕某一具体产业展开,从而忽略了不同产业的异质性特点;二是少有研究从空间视角出发就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的关系展开分析,并且鲜有分析其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三是已有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层面和不同省域之间,而就某一省份不同设区市产业集聚情况少有描述。设区市行政区域是各部门开展活动、政策落地实施的基本单元,产业集聚大都分布于设区市区域,将研究对象转向位于设区市区域的产业更能捕捉到集聚和创新的空问效应。基于以上情况,本文聚焦浙江省11个设区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情况,以空间视角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空问溢出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的相关理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主要通过增长极效应、知识溢出及规模经济效应三方面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从增长极方面看,根据中心-外围理论,市场主体在进行创新活动时引发空间上的要素聚集和重组,这种集聚及重组产生的增长极效应对周边的创新活动主体有较大的虹吸效应,能够使其大量集聚,从而提高产业集聚度^[12]。此外,知识溢出使得市场主体在创新过程中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进而推动产业高度集聚。从知识溢出方面看,战略新兴产业集聚有利于产业间企业交流互动,推动知识和技术传播,区域内企业主体获取技术和知识更加便利,凭借资源互补优势,集聚区的企业能进行产业链整合和技术融合,进而带动集聚区的创新绩效提升^[13]。从规模经济方面看,首先,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产业集聚规模在一定范围内的扩大能增加区域整体的规模效益^[14]。产业集聚有利于性质特点类似的企业共享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和服务,并且容易产生创新要素及资源的积累,企业进行创新投入时的要素成本和资源获取成本相对较低,这有利于集

聚区的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区域创新成本,进而提高区域创新水平^[15]。其次,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的企业大多性质类似或处于同一产业链,企业间更容易共担利益和风险,企业间沟通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相对较低,这能进一步降低区域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容易达成创新合作,从而提高区域的创新水平。最后,由于集聚优势的存在,集聚区往往更容易吸引新兴产业的企业加入,新企业的加入又进一步提高集聚程度,内部竞争和合作推动区域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于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会产生积极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和创新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创新受周边地区创新要素的共同影响。根据知识溢出效应理论,知识溢出对创新活动产生正向影响,有助于推动区域间的经济均衡发展。知识溢出主要受到距离的影响,随着距离的不断加,知识溢出效应呈减弱趋势。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企业高度集聚,不同资源和要素高度集中,集聚区的企业在产品贸易时容易引发文化、知识、技术的溢出,而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同样能引发知识溢出,如人才在不同区域的流动会将知识技能带去新区域,从而产生知识和创新溢出^{[16][17][18]}。而且,通过当地的科研平台和机构媒介,知识和技术在不同企业之间加速传播,不同市场主体的交流互动更容易引发区域创新。通过产品流动、要素流动和科研机构、专业媒介等渠道,知识溢出不仅节约了企业大量技术创新成本,还会增强区域内新兴产业内部企业知识技术学习便利性,对区域创新水平提高起到促进作用^{[19][20][21]}。此外,城市间存在知识、技术的追赶与竞争关系。落后城市往往会向先进城市学习,继而产生相应知识与技术的溢出。邻近地区技术水平和创新水平越高,创新资源越丰富,当地在获取创新资源时就更便利,在提高当地的技术和知识水平方面就更有利。因此,邻近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能

够推动当地的技术学习,对提升当地的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本文由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H2: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本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

三、模型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1. 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探索浙江省 11 个设区市的区域创新能力与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关联性及其集聚模式,在确定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前,需对区域创新能力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莫兰指数 (Moran's I) 检验,具体如公式 (1) 和公式 (2) 所示。

$$I_G = \frac{n \sum_{i=1}^n \sum_{j=1}^n W_{ij} (Y_i - \bar{Y})(Y_j - \bar{Y})}{\sum_{i=1}^n \sum_{j=1}^n W_{ij} \sum_{i=1}^n (Y_i - \bar{Y})^2} \quad (1)$$

$$I_L = \frac{(Y_i - \bar{Y}) \sum_{j=1}^n (Y_j - \bar{Y})}{S^2} \quad (2)$$

公式 (1) 为全局莫兰指数 (I_G) 测算,从整体上衡量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自相关程度,公式 (2) 为局部莫兰指数 (I_L),对各设区市产业之间的空间差异情况进行测算。其中, n 为浙江设区市数量, Y_i 、 Y_j 表示 i 、 j 城市的属性值,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莫兰指数取值在 -1 至 1 之间。莫兰指数越接近于 1 ,就表示研究对象在空间上呈现的相似值的集聚度越高;莫兰指数越接近于 -1 ,就表示研究对象在空间上呈现的相异值的集聚度越高;莫兰指数为 0 时,表示研究对象在空间上随机分布,不存在相关性,未表现出集聚或离散特征。

2.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空间计量模型有空间滞后模型 (SLM)、空间误差模型 (SEM) 和空间杜宾模型 (SDM) 三种,

本文构建公式如下。

空间杜宾模型 (SDM) 表达式:

$$INNO_{at} = \rho WINNO_{at} + \beta_1 LQ_{at} + \beta_2 IR_{at} + \beta_3 OPENNESS_{at} + \beta_4 GE_{at} + \beta_5 FDIR_{at} + \beta_6 H_{at} + \phi WINNO_{at} + \phi_1 WLQ_{at} + \phi_2 WIR_{at} + \phi_3 WOPENNESS_{at} + \phi_4 WGE_{at} + \phi_5 WFDIR_{at} + \phi_6 WH_{at} + \lambda a + \varepsilon_{at} + \gamma t \quad (3)$$

空间误差模型 (SEM) 表达式:

$$INNO_{at} = \beta WINNO_{at} + \beta_1 LQ_{at} + \beta_2 IR_{at} + \beta_3 OPENNESS_{at} + \beta_4 GE_{at} + \beta_5 FDIR_{at} + \beta_6 H_{at} + \lambda a + u_{at} \quad (4)$$

$$u_{at} = \lambda Wu_{at} + \varepsilon_{at} \quad (5)$$

空间滞后模型 (SLM) 表达式:

$$INNO_{at} = \rho WINNO_{at} + \beta_1 LQ_{at} + \beta_2 IR_{at} + \beta_3 OPENNESS_{at} + \beta_4 GE_{at} + \beta_5 FDIR_{at} + \beta_6 H_{at} + \varepsilon_{at} \quad (6)$$

公式 (3) 至公式 (6) 中, $INNO_{at}$ 表示浙江省内 a 城市 t 年份的地区创新能力; LQ_{at} 是 a 城市 t 年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 W 是构建的浙江省各设区市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IR_{at} 、 $OPENNESS_{at}$ 、 GE_{at} 、 $FDIR_{at}$ 、 H_{at} 分别表示 a 城市 t 年份的产业关联、对外开放、政府支出、外商投资和人力资本; β 为变量的系数, 反映的是各地区变量对本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 ε_{at} 是 a 城市在不同年份 t 的随机扰动项; ϕ 是空间相关性系数; λa 、 γt 分别是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 区域创新能力 (INNO)。本文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授权和引用的数据。专利数据能直接反映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能力, 因而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专利数据衡量企业创新水平^[22]。陈爱贞等采用专利申请数衡量并购前后企业创新水平的变化^[23]; 顾夏铭等将创新变量分为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 采用企业当年发明专利申请量、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衡量企业创新活动^[24]。

核心解释变量: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

(LQ)。目前, 测量产业集聚程度的方法主要有投入产出法、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等, 本文考虑地理空间因素, 选择区位熵作为产业集聚的测量方法, 计算公式为:

$$LQ = (E_{ij}/E_i) / (E_j/E) \quad (7)$$

公式 (7) 中, LQ 为区位熵指数, LQ 值越大表示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反之则产业集聚程度越低, LQ 大于 1 时, 通常认为该地区产业发展较集中, 当区位熵值小于 1 时, 则认为该地区产业发展较分散; E_i 表示 i 地区所有产业的总产值; E_j 表示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 E_{ij} 表示 i 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产值; E 表示地区产业总产值。利用公式 (7) 测算出浙江省 2011 年—2021 年各设区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区位熵指数, 具体结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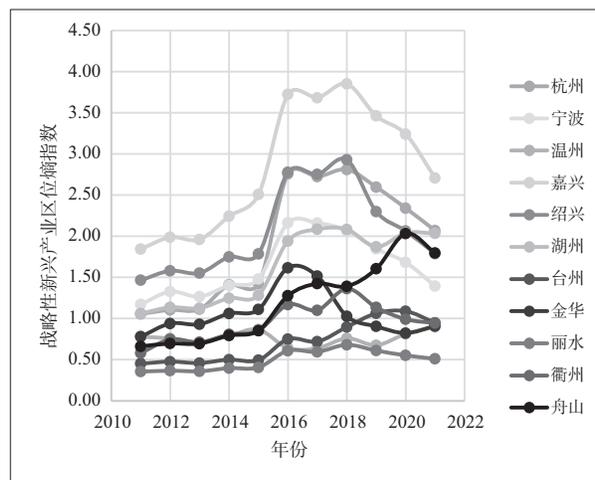


图 1 浙江省 2011 年—2021 年各设区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区位熵指数

控制变量: 产业关联度 (IR)、人力资本 (H)、对外开放程度 (OPENNESS)、政府支出 (GE) 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占比 (FDIR)。

2. 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 2011 年—2021 年浙江省 11 个设区市的市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名称	测量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INNO	创新能力	各地区专利申请数占全省专利申请数比重	0.09	0.07	0.00	0.31
自变量	LQ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位熵	1.39	0.80	0.35	3.85
控制变量	IR	产业关联度	各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	0.18	0.09	0.05	0.48
	H	人力资本	每万人高校在校人数(个)	165.32	110.20	43.23	533.49
	OPENNESS	对外开放程度	地区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0.46	0.36	0.03	2.23
	GE	政府支出	各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0.02	0.01	0.01	0.04
	FDIR	外商直接投资占比	外商直接投资占比	0.02	0.02	0.00	0.05

注：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局以及各设区市统计局。

四、实证分析

(一) 空间相关性分析

1. 全局 Moran's I 指数分析

根据公式(1)，本文对 2011 年—2021 年浙江省的创新能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全局 Moran's I 指数分析

时间	INNO		LQ	
	Moran's I	P 值	Moran's I	P 值
2011	-0.024*	0.096	-0.292*	0.063
2012	-0.017**	0.037	-0.223*	0.075
2013	-0.037**	0.032	-0.206*	0.071
2014	-0.087**	0.049	-0.198*	0.063
2015	-0.099*	0.097	-0.189*	0.064
2016	-0.133*	0.076	-0.134**	0.012
2017	-0.126*	0.093	-0.163*	0.055
2018	-0.152*	0.063	-0.275*	0.097
2019	-0.122*	0.085	-0.293*	0.055
2020	-0.102*	0.092	-0.333*	0.076
2021	-0.090*	0.054	-0.335**	0.035

注：* 表示 10%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5%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文同）。

检验结果显示，浙江省 11 个行政地区创新能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的 Moran's I 指数均为负值，且所有年份均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表明，浙江省各个设区市的创新能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整体表现为相异值之间的空间集聚，即高创新能力的地区趋于和低创新能力的地区相邻，高发展水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地区趋于和低发展水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地区相邻。整体来看，2011 年—2021 年浙江省各地区的创新能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的全局空间相关系数呈现小范围的波动，但总体平稳。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系数位于 $[-0.152, -0.017]$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相关系数位于 $[-0.335, -0.134]$ ，整体表现较为稳定。这表明浙江省 11 个设区市的区域创新能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的空间相关性，这可以进一步做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2. 局部 Moran's I 指数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浙江省各地区创新能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局域集聚特征，本文分别截取 2011 年和 2021 年的数据，并结合 Moran's I 散点图对浙江省 11 个设区市进行局部关联性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是基于浙江省 11 个设区市经济距离矩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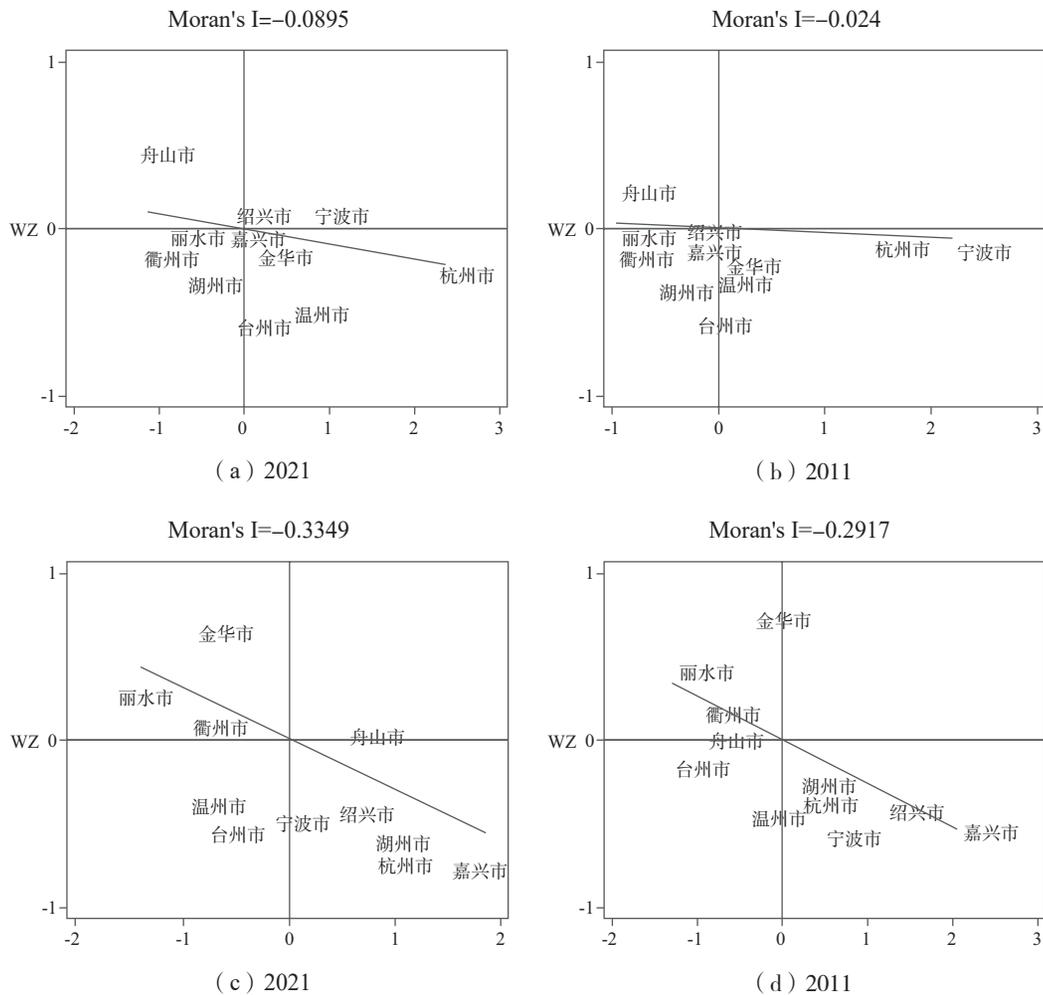


图2 2011年、2021年浙江省各设区市创新能力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Moran's I散点图

计算的2011年和2021年浙江省11个设区市创新能力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Moran's I散点图。其中，图(a)、图(b)是利用2021年、2011年11个设区市发明专利数计算得出的Moran's I散点图，图(c)、图(d)是依据2021年、2011年11个设区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区位熵计算得出的Moran's I散点图。图2中的直线斜率表明浙江地区的创新能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存在空间负自相关效应。

在图2中，不同象限代表不同的空间自相关模式。位于第I象限的点为高-高集聚(HH)，表示该地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创新能力或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聚水平均处于较高水平；位于第II象限的点为低-高集聚(LH)，代表该地区创新能力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但其邻近区域的创新能力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位于第III象限的点为低-低集聚(LL)，表示该区域与邻近区域的创新能力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位于第IV象限的点为高-低集聚(HL)，表示该区域的创新能力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且其邻近区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结合2011年与2021年的Moran's I散点图，将浙江省各地区空间关联模式列入表3和表4。

表 3 2011 年、2021 年浙江省创新能力空间关联模式

象限	空间关联模式	2011 年	2021 年
第 I 象限	HH		宁波、绍兴
第 II 象限	LH	舟山	舟山
第 III 象限	LL	丽水、衢州、湖州、绍兴、嘉兴、台州	丽水、衢州、湖州
第 IV 象限	HL	温州、金华、杭州、宁波	杭州、嘉兴、金华、温州、台州

表 4 2011 年、2021 年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空间关联模式

象限	空间关联模式	2011 年	2021 年
第 I 象限	HH		舟山
第 II 象限	LH	金华、丽水、衢州、舟山	金华、丽水、衢州
第 III 象限	LL	台州、温州	温州、台州
第 IV 象限	HL	湖州、杭州、宁波、绍兴、嘉兴	宁波、绍兴、湖州、杭州、嘉兴

由表 3 四个象限的分布情况可知, 2011 年浙江省创新能力空间分布位于第 I 象限、第 II 象限、第 III 象限、第 IV 象限的城市分别有 0 个、1 个、6 个、4 个, 而 2021 年则分别有 2 个、1 个、3 个、5 个。总体看来, 浙江省创新能力空间分布位于第 III 象限、第 IV 象限, 处于低-低和高-低分布的设区市较多。从动态变化上看, 宁波创新能力从高-低 (HL) 模式转向高-高 (HH) 模式、绍兴创新能力从低-低 (LL) 模式转向高-高 (HH) 模式, 这表明与宁波相邻的城市创新能力均有所增强, 绍兴市及其邻近城市的区域创新能力均有所增强。总体上, 浙江省各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分布以高低集聚与低低集聚为主, 区域创新能力分布不均衡。表 4 的四个象限的分布情况显示, 2011 年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空间分布位于第 I 象限、第 II 象限、第 III 象限、第 IV 象限的城市分别有 0 个、4 个、2 个、5 个, 而 2021 年则分别有 1 个、3 个、2 个、5 个。总体看来, 浙江省各设区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空间分布位于第 II、第 IV 象限的低-高分布及高-低分布较多, 这表明浙江省各设区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整体表现为负向的空间相关关系。从动态变化上看, 舟山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从 2011 年的低-高 (LH) 模式转向 2021 年的高-高 (HH) 模式, 表

明该城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有所增强。整体看, 浙江各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高低集聚与低高集聚为主, 两极格局较为明显。

(二) 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分析

1. 模型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前, 应对空间效应存在的形式进行检验, 从而在 SLM、SEM 及 SDM 三种模型中选择更合适的模型进行分析检验。由表 5 得知, LM 检验结果表明, SLM 和 SEM 统计值的 P 值均小于 10%, 表明存在空间自相关, 应选择 SDM 作为主模型展开分析。为进一步研究 SDM 是否可行, 本文选用 LR 检验和 Wald 检验进一步判断 SDM 是否能退化为 SLM 或 SEM。LR 检验结果显示, SLM 和 SEM 统计值的 P 值均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 SDM 不能退化成 SLM 或 SEM。Wald 检验结果显示在 5% 的置信水平下否定了原假设, 同样表明 SDM 不能退化成 SLM 或 SEM。根据 LM、LR、Wald 检验结果, 本文确定采用 SDM 进行计量分析。为进一步确定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再次进行豪斯曼 (Hausman) 检验, 根据统计结果, SDM 统计值的 P 值通过了 1% 的置信水平检验, 故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综上, 本文选用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作为计量分析模型。

表 5 模型检验结果

模型	SLM		SEM		SDM	
	Statistic	p-value	Statistic	p-value	Statistic	p-value
LM	5.498	0.060	2.000	0.056	-	-
Robust LM	1.062	0.030	1.317	0.051	-	-
LR	13.260	0.030	17.990	0.006	-	-
Wald	13.650	0.033	19.280	0.003	-	-
Hausman	-	-	-	-	89.730	0.000

表 6 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

	Ind (个体固定效应)	Time (时间固定效应)	Both (双向固定效应)
LQ	0.0175*	0.0104	0.0174*
	(-2.10)	(-0.69)	(-2.00)
IR	0.251***	-0.0958	0.245**
	(3.87)	(-0.78)	(2.99)
H	0.000341***	0.000407***	0.000339***
	(6.38)	(6.87)	(5.06)
OPENNESS	0.0117	-0.00162	0.0118
	(1.33)	(-0.09)	(1.06)
GE	0.646	-3.935***	0.610
	(1.01)	(-4.63)	(0.89)
FDIR	-0.0890	0.414	0.00639
	(-0.27)	(0.94)	(0.02)
W*LQ	0.0260*	-0.0449	0.0284*
	(2.22)	(-1.21)	(1.24)
W*IR	-0.202*	0.196	-0.265*
	(-2.00)	(0.53)	(-0.99)
W*H	-0.000263*	0.000489	-0.000246*
	(-2.46)	(2.38)	(-1.72)
W*OPENNESS	-0.00737	-0.0331	-0.00827
	(-0.60)	(-0.97)	(-0.37)
W*GE	-0.236	-0.402	0.00659

	Ind (个体固定效应)	Time (时间固定效应)	Both (双向固定效应)
	(-0.24)	(-0.28)	(0.00)
W*FDIR	1.596**	1.365	1.979**
	(2.61)	(1.36)	(2.74)
rho	-0.408**	-0.391**	-0.424**
	(-3.03)	(-2.76)	(-3.02)
σ^2	0.000318***	0.00143***	0.000316***
	(7.50)	(7.68)	(7.39)
r ²	0.151	0.592	0.162
N	121	121	121

注: * p<0.1, ** p<0.05, *** p<0.01。

2. 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在全样本条件下,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空间杜宾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LQ)系数为0.0174,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浙江11个设区市的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则该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会上升0.0174%,回归结果与假设1(H1)相符。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能推动知识、技术及经验传播,一方面能减低信息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又能带来规模效应。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能引发集聚区的企业展开技术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进而带动整个集聚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从控制变量上来看,产业关联度(IR)和人力资本水平(H)、对外开放(OPENNESS)、外商投资占比(FDIR)及政府投资(GE)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均显著为正。高产业关联度对地区整个产业的效率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和核心技术提升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H)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高技术人才越多,集聚水平越高,区域创新水平越高;对外开放程度(OPENNESS)和外商直接投资(FDIR)也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影响因

素。浙江省是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与外界高效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引发技术和创新流动,从而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W*为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中的相邻矩阵项对应的系数,代表各变量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LQ)系数的W*系数为0.0284,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浙江省各设区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即邻近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提高能够推动本地创新能力的提升,实证结果与假设2(H2)相符。控制变量产业关联度(IR)的W*项系数为-0.265,人力资本水平(H)的W*项系数为-0.000246,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产业关联和人力资本水平有空间虹吸效应,相邻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投入水平的提高会抑制本地的创新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R)的W*项系数为1.979,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综上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产业关联度、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本区域的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溢出效应方面,提高本区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和外商投资水平能推动相邻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但随着本地区

的产业关联度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邻近区域的创新能力会被显著抑制。

3.SDM 效应分解

SDM 的回归系数无法反映本区域关键变量对其他区域创新能力的影 响程度。为进一步探究本区域关键变量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本文将 SDM 进行效应分解，结果如表 7 所示。检验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为正，且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具体来看，本区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 1%，本区域的创新能力将提高 0.0325%，邻近区域的创新能力会提高 0.0205%，这再次验证了假设 2（H2）。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存在空间网络外部性，集聚产生的外部性既能推动本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又能随着不同区域间的合作互动、产业链的深化推动邻近区域获取创新

资源，进而推动邻近区域的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关联直接效应的系数为 0.298，通过了 1% 的显著水平检验，这表明产业关联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的创新能力提升，但产业关联的间接效应（溢出效应）为 -0.008 且未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是浙江省产业发展在各区域表现出不均衡特征，导致其空间依赖性和紧密性降低，而浙江省人力资本也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降低了其空间依赖性和紧密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遵循“文献综述、理论分析、模型构建、实证分析”的研究框架，选取 2011 年—2021 年浙江省的面板数据，采用区位熵指数法对全省 11 个设区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现状进行评估，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并采

表 7 SDM 效应分解

变量名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Q	0.0325**	0.0205	0.053**
	-0.0104	-0.0199	-0.0173
IR	0.298***	-0.008	0.29***
	-0.079	-0.203	-0.207
H	0.0004***	-0.000323***	7.68E-05
	-6.82E-05	-0.000112	-0.000113
OPENNESS	0.0133	-0.0122	0.00119
	-0.0109	-0.0188	-0.0193
INNO	-0.382*	-0.34*	-0.722*
	-0.587	-2.096	-2.429
GE	0.655	-0.241	0.414
	-0.723	-1.226	-1.168
FDIR	-0.279	1.725***	1.446**
	-0.371	-0.627	-0.663

注：N=121；* p<0.1，** p<0.05，*** p<0.01。

用偏导数矩阵对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实证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以及产业关联、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外商投资、政府支出等控制变量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

响。本文最终的结论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能力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两者的全局和局部 Moran's I 指数均小于 0,均存在负向的空间相关性;浙江省各设区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本地区的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本区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邻近区域的创新能力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能提升邻近区域的创新能力;产业关联度、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外商投资占比及政府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均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 政策建议

立足区域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实证分析发现,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不均衡,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湖州等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程度较高,而邻近的温州、台州、丽水、衢州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较低。因此,浙江省内各城市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挥区域优势。例如,杭州高新区聚焦信息技术、生命健康、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宁波高新区发挥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产业优势,温州高新区立足激光光电、电商、软件等基础产业,以此深度推进各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发挥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各设区市应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深化产业链价值链,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集聚度,充分发挥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本文研究结论,舟山、衢州和丽水等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区域创新能力相对弱,这些地区应加强学习先进技术,利用好区域特色资源,加大与创新能力较强的区域交流合作。同时,要进一

步发挥杭州、宁波、嘉兴等产业集聚水平较高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积极推进这些城市与邻近城市的产业关联,避免无效集聚。

加大人才招引力度,完善人才培养制度。人力资本能显著提升本区域的创新能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需要高度集中的专业性人才,各区域应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加大专业人才招聘力度,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梯队,实施积极的人才政策,灵活运用产业集聚政策吸引人才,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为产业对口输送专业人才,丰富人才供给渠道。

参考文献:

- [1] 杨浩昌,李廉水,张发明.制造业集聚对创新生产率的影响及区域比较[J].科学学研究,2020(1):63-75.
- [2] 董晓芳,袁燕.企业创新,生命周期与聚集经济[J].经济学,2014(2):767-792.
- [3] 杨坤,朱四伟,胡斌.空间关联视阈下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不同细分产业的实证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0(3):93-100.
- [4] Dijk M, Soltan S. Palestinian Clusters: From Agglomeration to Innovation[J].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2017(13): 323-336.
- [5] Goldman B, Klier T H, Walstrum T. Evidence on the Within-Industry Agglomeration of R&D, Produ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Occupations[EB/OL]. (2016-11-14). <http://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72936/1/wp2016-20.pdf>.
- [6] 张可,徐朝晖.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交互影响——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J].财经科学,2019(1):75-86.
- [7] 孙超,王燕.高新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J].科技管理研究,2020(22):139-147.
- [8] 戴玲,唐晴晴.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异质性产业集聚与协同集聚视角[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22(2):27-34.
- [9] 王晓彦,欧娇娇.产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 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J].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27-35.
- [10]马亮,高峻.高技术产业集聚促进绿色发展效率了吗?——动态与空间溢出视角[J].管理现代化,2022(3):24-31.
- [11]徐丹,于渤.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6):29-37.
- [12]Capello R, Lenzi C.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exus: Conceptual Reflec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4(2): 184-216.
- [13]李金滢,宋德勇.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集聚经济——基于中国地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2):25-34.
- [14]P.R.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3): 483-499.
- [15]吕承超,商圆月.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与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研究[J].管理科学,2017(2):64-79.
- [16]曾刚,耿成轩,翁旻.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技术经济,2021(2):56-64.
- [17]柳卸林,杨博旭.多元化还是专业化?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0(9):141-161.
- [18]程中华,刘军.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制造业创新——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4):34-44.
- [19]王雅洁,韩孟亚.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的空间联立方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12):59-68.
- [20]吕平,袁易明.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6):118-125.
- [21]李太平,顾宇南.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78-87.
- [22]安同良,魏婕,舒欣.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测度——基于微观创新调查的跨期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2020(3):99-122.
- [23]陈爱贞,张鹏飞.并购模式与企业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9(12):115-133.
- [24]顾夏铭,陈勇民,潘士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8(2):109-123.

责任编辑:蒋建忠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年重点选题与征稿启事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双月刊)是由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主管、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苏中华文化学院)主办,以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以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本刊是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政党制度、新的社会阶层、民营经济、民族与宗教、中华文化、学习与思考等栏目,竭诚欢迎惠赐稿件。

一、2024 年重点选题

- (一) 统一战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 (二) 统一战线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
- (三) 统一战线基本理论、范畴与话语体系研究
- (四) 统一战线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 (五) “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研究
- (七) 政党政治研究
- (八)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
- (九)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研究
- (十)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研究

以上重点选题供参考,欢迎广大作者据此结合研究专长和所关注问题自拟题目撰稿。对重点选题范围内稿件,本刊将优先选用,优稿优酬。

二、来稿要求

1. 稿件做到导向正确、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表达规范。
2. 稿件字数 8000—12000 字,请通过本刊采编平台投稿。
3. 来稿请注明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单位名称、职称、职务等)、联系方式以及详细地址,并遵守相关学术规范(须有内容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部分)。
4. 稿件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查重率不高于 15%。每篇稿件引注不少于 5 条。

三、几点声明

1. 本刊对决定采用的稿件,有权进行必要的修改,并拥有该稿件的编辑权、汇编权、翻译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发行权等权利。作者一经投稿,即视为同意本刊所声明的一切权利。作者需保证稿件的原创性,且不涉及保密及其他与著作权有关的侵权问题,否则一切责任由作者自负,本刊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来稿一律不予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凡两个月内没有收到稿件的修改意见或用稿通知,作者可以自行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 本刊已被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龙源期刊网数据库,以及 CNKI 系列数据库收录,并由其对外提供信息服务,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刊不以任何名义向作者收取费用。

采编平台网址: <http://jsyb.cbpt.cnki.net>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电话:025-84287222

邮编:210007

传真:025-84287298 转 7221